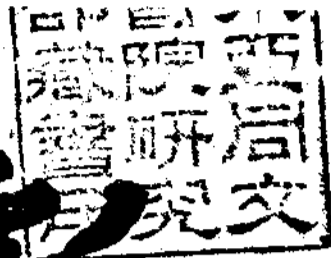


昭和十五年五月廿日



新世紀

半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論壇

和平方案的檢討
日本的齋藤事件
美副國務卿遊歐
法幣價值又跌

專載

論中日經濟合作(下).....力菴
論滬關貿易出超問題.....張祖望
太平洋現勢的剖視.....陶玉麟

譯著

致汪精衛先生書.....尾崎秀實
共產主義宣告破產了.....Nathaniel Peifer
遠東和平解決的途徑.....T. A. Bisson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續).....J. W. Wheeler-Bennett
第五章 僵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和平方案的討論

最近國內的視線，都集中在和平方案，現在此項方案尚未公佈，我們所看見的，不過是在香港所發表的文件，而此項文件的真實性，是早經一般人的否認，所幸正式和平方案，公佈之期已不在遠，真相自可大白於天下了。

就客觀形勢而言，中國所處的地位，並非亡在旦夕，所以亡國條件，決非中國所能接受；日本也明知滅亡中國為不可能，所以亡國條件，也決非日本所能提出。固然和平方案的作成，對於中國當然有所損失，但是這種損失不致妨礙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和平方案即不能不認為滿意，如果和平方案，足以根本調整中日關係，使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礎足以奠定，那們和平方案就是很大的功績了。

據中國共產黨的大話，中國要等到鴨綠江畔，才談和平。照幽默者的意見，他們的話是有實現可能的，因為將來他們從新疆逃亡到蘇俄，再乘西伯利亞火車，自可達到鴨綠江畔，至於說共產黨真的可以打到鴨綠江畔，這是誰都不相信的。重慶方面所表示的希望是比較合理多了，因為重慶當局只求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況，但是一般的論調唱得太高了，所以這一點明知可以辦到，也無法接受。

我們認為由汪先生作成的和平方案，在領土主權的完整方面，必可達到七七事變前的狀況，而和平方案的成就，也決不限於此，因為單單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況，而不把事變的癥結解決，不替中日兩國打開一條新路，那們和平方案還是毫無價值可言。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非忍辱負重的大政治家不為功。而決非徒唱高調可能濟事的。

現在日本已感覺到中日的關係，有更始的必要，而中國響應的，又是偉大愛國者汪先生，所以和平方案的作成，其着眼必在中日永久的和

平，這是可以斷言的。

日本的齋藤事件

最近日本議會中，因議員齋藤發表一篇演說，曾掀起日本國內巨大的政潮。在該消息最初傳來的時候，因電文簡略，給予一般人的印象，是日本政黨反對近衛聲明，反對不割地不賠款，及撤兵等原則，而軍部方面則表示全力擁護近衛聲明。在中國方面，一向認為日本政黨的對華政策是緩和的，而軍部是急進的，現在好像適得其反，這足以使我們感覺，分驚訝。

自後全部演說，除後段因官方未有記錄外，抵達我們之後，才明確實在的情形。日本政黨方面，並非反對近衛聲明，當然也不反對不割地，不賠款及撤兵等原則，政黨方面的表示，其中心點在憂慮中日戰事的曠日持久，日本政府方面究竟用何種方法趕速解決罷了。至於齋藤失言之處何在，電文也未明指，又日本政府方面何以如此重視，這是日本內政問題，我們無庸多加討論。

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近衛聲明，已成日本確切不移的國策，軍部政黨及一般國民都是一致擁護，所爭論的，不過是利用何種方式以貫徹近衛聲明罷了。日本方面是很明瞭這種困難情形的，他們知道以中央政府為對手，可以打開中日永久和平的路，但是辦不到馬上停戰；以重慶為對手，可以馬上辦到停戰，但是打不開永久和平的路。就日本政府立場而言，它顯然已決定選擇較困難的途徑，以達到理想的結果，我們從齋藤事件可以得到明確的認識。

美副國務卿遊歐

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行將遊歐，據國務卿赫爾談話，表示威氏此行

並非調停歐戰，而在探討歐戰停止後，如何將經濟納於正軌。誠然純粹的資本主義，足以促進戰爭，而共產主義，更足擾亂世界的安寧，然而大戰之後，正是共產主義變化的好機會，所以就木雨綢繆計，努力的方向，自然在防制歐戰的擴大，或是及早解決，因為歐戰能早日解決，德英法才不致為共產所乘，而戰後經濟才有納入正軌的可能，所以威氏此行，雖未明言係調停歐戰，而其致力的方向，無疑的是趨向此途的。特別威氏抵英之後，即聘問羅。現在羅馬是介乎德英法之間，墨索里尼係，開旋最適當的人物，於此更可，得蛛絲馬跡了。

尤可注意的，就是在威氏決定遊歐之前，美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痛斥共產主義。現在列強政府後面，都是資本家在撐腰，他們因利益衝突，固然也會對立，但是對於共產主義卻無不深惡痛絕。德國是反共的國家，此次雖與蘇俄結合，但不過利用蘇俄以應付英法而已，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則，並未絲毫改變，我們甚至可以說，因為德蘇致蘇俄以分波瀾，使共產假面具完全揭穿，這倒是反共最妙的手段。英國是絕不容許共產主義的，這一點是世人週知的。法國雖比較寬容一些，但是歐戰發生後，就把共產黨議員加以逮捕。意國的墨索里尼，其掌握政權，即由反共而起，當然不必說了。日本的國策是反共，因為它的社會及經濟組織，是絕對不容共產主義存在的。美國一向也是反共的，不過因為蘇俄高唱和平正義，未便有所表示，現在既然揭穿，所以羅斯福也正式宣告反共了。一般國際觀察家，認為國際間最大的趨勢，是列強聯合起來，共同反共，或氏此行，對於這個大趨勢，必然會增加很大的推動力量。

和平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反共，雖然對於國際潮流是元全順流的，但是這個目標的確立，並不是想順着國際潮流而起，而就中國的本身設想，根本不能容許共產主義的存在。從前重慶方面，被和平陣線等口號所迷惑，認為容納共產黨，不僅可獲得蘇俄的同情，而且也可獲

得英美法的同情，現在國際間的情勢，已顯然呈露國際反共，所以在月前不得不命朱家驊發表一個談話，說共產黨的力量不大，好叫英美放心，以後又發生不斷的國共衝突事件，現在美總統發表反共談話，又有威爾斯遊歐之行，不知重慶方面作何感想？

法幣價又跌

在歐戰初起後，法幣價值忽呈回蘇現象，於是一般宣傳家，大為鋪張，指為法幣基礎鞏固，雖為操縱者一時振低，但不久仍趨回漲云云。然而細考當時回蘇的原因，既不是中國戰事得利，又不是生產增加，因為在事實上戰事失利，生產減少，其原因實為香港及星加坡等地華僑，因恐慌幣及星幣跌價及禁止匯出，所以趕快匯過，購買地產等。因此法幣匯價忽然回蘇，但是一般經濟觀察家，早就看定這種回蘇的情形，完全是由於特殊的關係，其本身是缺乏回蘇的理由。他們並斷定戰事一天不停止，法幣的價值只有繼續下降的一途，其實這是一種常識，正不必待經濟學者才能道破。近來外埠購買法幣的趨勢已減，於是法幣匯價又開始猛跌了。據二月十五日行市，黃金每條（十兩）售價高至四千八百八十元，而國幣百元，僅可購美幣六元七角五分。就一般情勢看來，法幣匯價正在降落中。

法幣的匯價，在前幾月中，還呈暫時高漲低的情形，至於法幣的價值，正不斷的在降落中。法幣的匯價，猶可用「少購外貨，刺激出口」等不妥當理由來掩飾，至於法幣本身價值的暴落，卻是不容絲毫加以掩飾的。在戰前白米每石約八元，現為五元，即法幣一元，僅抵戰前一角六分之用；在戰前煤球每担一元，現為六元四角，即法幣一元，亦僅抵戰前一角六分之用，國家經濟弄到如此地步，即使人人餓死，也不知道最後勝利在那裏！

專

載

論中日經濟合作(下)

力菴

我們在上面指出，關於棉產問題，中國合作的途徑，決不在推廣植棉的理由。現在我們要討論到收花的問題。第一是棉花價格的估計。關於花價的估計，大部分視生產量而定，所以收花機關常須考察各地產花情形，以定本年棉產數量，並由數量之增減而估計花價的大小。例如本年天時適宜，害蟲稀少及棉田增加，則吾人可預料本年棉產必然增加，即花價可期待低。反之，如氣候不正，害蟲為患及棉田減少，則吾人可預料本年棉產必然減少，即花價恐趨高漲。從這種估計，收花機關可決定收花的方針，如估計棉產減少，則收花者即宜及早湧進，藉防貨少價昂之累。在昔中國交通不便，工業落後，棉花僅在當地銷片，以供農村副業，及非工業之用（如將棉花嫩被褥及填棉衣）所以各地價值相距甚遠，更與世界市場無關，現在中國棉價雖與世界市場，已發生密切關係，但各地收花豐歉與否，與中棉價格仍有極重大的影響，是以花價的估計正確與否，對於收花機關的虧贏有莫大的關係。中國為維護日商收花機關利益起見，應予日商調查棉產的種種便利。其次是關於倉庫問題。

就狹義而言，倉庫僅係存儲棉花，就廣義而言，倉庫可兼營收花，軋花，打包等各項工作。中國收花轉手太多，致使農民所獲的利潤減少，同時機雜滲水的弊端也因此發生。近來廠家多有直接收花，或委託花莊代收，其目的在價值可較花販所售者為廉，同時棉花清潔對於工廠方面尤為便利。故從廠家及農民兩方利益着想，其交易能愈直接為愈佳。在這一點上，中國可允許日商在各地直接收花。又收花必須有許多附帶工作，如軋花，以軋去花籽；如打包，使容積減少，以便運輸；如堆儲

，以堆積棉花，所以中國不但可允日商在各地直接收花，並可允日商在各地設立倉庫，並附設軋花廠及打包廠等。至於資本問題，則中日商人合資亦可，日商獨資亦可，惟須依照中國公司法罷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一方面盡其最大努力，從事促進水利，改良棉種，防除害蟲，並改善農村經濟及水陸運輸，使棉產增加。同時日商在收花方面，其所有的便利，則與華商相同，這樣中國的農民可以獲得利益，日本的商人也獲得利益，而中日商人間的競爭，其機會也是相等，所以不致發生衝突。也唯有採取這樣的辦法，合作才能永久維持下去。

不過我們必須指出中國棉產的增加，也有其限度，至於棉質的改進，更有其限度，如果希望中國棉產可以解決日本的全部問題，這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促進水利及禁植罌粟，固然可使棉田增廣，同時改良棉種，也可使棉產增加，但是增加是有其限度的。在戰前五年間，我們從大量的棉花輸入，能達到自給的地步，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米麥還有大量的輸入，這一個嚴重問題也正待解決，所以棉田的增廣，也不容超過相當限度。我們在目前固然無法預料中國將來可以供給若干棉花給日本，但是鑒於以前的進步，及許多可能性（例如導淮工作完成後，蘇北的棉田即可大為增大）我們深信在和平實現幾年之後，中國即可有大宗棉花輸往日本，至於希望完全滿足日本的需求，在目前是無法肯定的。又中棉質地欠佳，大部分僅可紡十六支紗，以織粗布，自棉種改良後，已可紡二十支紗，最佳者可紡至二十四支，但所織之布，仍係粗

厚之布，僅銷行於寒帶及溫帶各地。至於精良之布，則須用三十二支以上較細之紗，此項較細之紗即須用美棉方可，中棉印棉皆無能為力。至於織更精良之布，則須用六十支以上之細紗，此則多用埃及棉，美棉亦不易為力了。至於中棉，因地土氣候關係，其質地的改進，有確定的限度，所以中國的棉產數量即有無限度的增加，日本還得購買埃及棉及一部分美棉的。

從以上情形看來，我們不免有一個疑問，就是日本所需要的棉花，中國並無法全部供給，然則日本爲什麼這樣注意中國的棉產呢？特別日本採用中棉，也得用錢買的，它既有錢當然也可以向美印去買，而且是現現成成的，爲什麼要在中國多費周折呢？這一個疑問，是值得我們詳細尋求答案的。我們從日本的輸入棉花統計看來，可知日本的棉紡織工業，差不多可說是完全恃靠着英美兩國，因爲印度是英國的屬地，而埃及的運輸也完全由英統制，美棉當然不必說了，所以單就棉花來源而言，如日與美發生衝突，則日必完全恃賴英國；如日與英衝突，則日必完全恃賴美國，如英美聯合，則來源即完全斷絕了，因此日本就國防上着想，在日本鄰近的地帶，實有增加棉產以備萬一的必要。我們對於棉產問題的着法，因此也不能限於經濟。

關於羊毛問題，我們從日本輸入羊毛統計，可知日本差不多完全仰賴澳大利亞，其詳細情形有如左表。（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入羊毛統計）

產地名	數量（單位千担）	數值（單位一千日金）
中國東北部	四，六	二六九
中國	五，一	六一一
英國	八，五	一一，一九〇
智利	一六，六	一，七四四
阿根廷	五七	六，五六一
南非洲	一四一	一七，三八九
澳洲	一一六九	一一四七，四九三
紐西蘭	一七九	一八，三一六

總計連其他一六四一 二〇〇，八九八

四

從右表看來，中國的羊毛在日本的輸入，實在處於最不重要的地位。中國出產的羊毛，其數量究竟有多少呢？說起來很慚愧，中國根本就沒有統計的數字，我們所有的，不過是海關的統計，表示中國輸出有若干而已。中國羊毛的產區，在蒙古及西北廣漠地帶，交通異常不便，並且距市場常極其遠，而產毛者又不知將雜物洗去，又不知打包，使運輸上更爲不合經濟。此外牧羊者剪毛的時候，不將脊部腹部及腿部分開剪下，甚至黑色及白色羊毛，也混在一起，使品質降低，因以上各種原因，中國所產的羊毛，在實際上能運出的，爲數甚微，大致大部分即在當地製造毛氈等物，或竟任其廢棄。至於中國羊毛的品質，也是很劣的，據云在青海一部分，所產的羊毛，品質極佳，但是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在戰前中國政府曾注意到改良羊種問題，但是成效很微，其最大原因，當然係在這樣廣漠地帶，推行改良的辦法，實在是一件極困難的事，至於政治關係，也不容忽視。據一般意見，關於改良羊種，無論中國如何努力，是絕對不能如澳大利亞所產的，其最要原因即在氣候關係。中國西北部及蒙古，常起大風，又近沙漠，所以羊毛必然是硬性的，至於澳大利亞的氣候，頗爲溫和，所以羊毛細而柔。大致中國羊毛僅能製造粗質氈毯等物，最多爲軍服，如嘩嘩毛衫等物，即無法製成。所以中國所出產的羊毛，決不能完全解決日本羊毛輸入的問題。我們知道，目前中國供給日本的羊毛，總計起來，不過佔日本輸入羊毛數量總數百分之六，將來無論如何努力，中國羊毛者日本輸入上，是決不能達到十分重要地位的。但是日本爲什麼這樣看重中國的羊毛哩？其理由是和棉花的情形大致相同，簡言之，就是國防問題。我們從右表中，可以看出日本所需要的羊毛，差不多完全由英屬地而來，如果日本一旦和英國衝突，日本羊毛的來源就完全斷絕，其嚴重情形，較棉花爲尤甚，所以日本希望在中國方面設法，藉以減輕對英的恃賴程度，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毛產，對日本的關係，還是政治重於經濟。

據一九三六年的統計，中國羊毛的產量，其情形約如左表。

國名	數量(單位一千公斤)	數值(單位千元)
比國	五	九
法國	一〇七	六九
德國	四三六五	四三七〇
英國	二四一	二四五
日本	一〇〇	八七
和國	一四四	一三三
美國	一一〇九〇	一〇五一九
總計(連其他)	一六〇六八	一五四四四

從右表中，可見中國毛產輸往日本的實在微乎其微。中國羊毛最大的顧客是美國，約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七十，其次是德國，約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五，至於日本連百分之一還不足。還有中國出產山羊絨毛，據一九三六年的統計，中國輸出總額僅一百五十萬公斤，最大的顧客是日本，約八十五萬公斤。由此可見中國的毛產，對於日本的毛織工業，決無重大的關係，即在將來，改進的程度，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說，日本注意中國毛產，其政治性質較經濟為重要。

我們就以上所述中國產毛情形看來，最主要的問題，還在運輸，次為洗毛打包，再次為防止羊毛的傳染病，至於改良羊種恐一時談不到。運輸的問題，最難解決，因為在這廣漠地帶中建築公路，建設費用最大，而路的效用則微，但是如果建築幾條重要幹線，在運輸上即可比較便利多多了。關於這一點，中國政府為謀邊疆人民福利，及適應日本的需求，似不妨作相等的努力，將來公路上可收的運費，即可充築路及養路的費用。其次談到洗毛及打包問題。中國羊毛中所含的雜物，常高至百分之六十。有許多羊毛從各處運到包頭，再從包頭運到經銷處，費去許多運費，然而結果百分之六十係雜物，這豈不是太不經濟子嗎？所以在各產毛集中點，應設立洗毛廠，先將羊毛大體洗滌乾（羊毛上所附着的脂肪，其洗滌達到何種程度，各廠常有不同意見，所以洗毛廠不宜完全洗滌）至於沙石及其他雜物，則可洗去，至於過量

的水分，也可在烘乾時加以調節。羊毛洗滌烘乾之後，再打成一定容積重量的包，而且在打包之前對於羊毛品質，也可加以選擇及鑑定，這樣對於運輸上既可較為便利，也較經濟，至於廠商交易尤為便利。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可以依照上述關於收花的辦法，即中國允許日商在各地設立洗毛廠及打包廠，其性質或係中日商人合辦，或係日本獨辦，皆無不可，惟一切須照中國公司法辦理罷了。再次談到防疫問題，我們認為關於防疫一切行政事宜，應全由中國辦理，至於研究等技術問題，則日本自可參加，同時第二國中的專家當然也可參加。最後談到改良羊種問題，這是困難的，不像改良稻種，中國已有了把握，所以我們主張中日共同在技術上研究是很需要的，但是將來實施改良的時候，我們就人事上設想，仍應完全由中國担任的。

關於棕麻等類的植物纖維，中國所產在日本輸入上，不占最重要地位。據一九三六年日本輸入材料統計，以斐列濱的出產占首位，中國雖處次位，但相差甚鉅，其詳情如左表。

產地名	數量(單位為一千日金)
中國	七,八五四
印度	七,三四二
荷屬東印度	五四六
斐列濱	二〇,六八〇
總計(連其他產地在內)	三,三〇一

綜麻紡工業，在中國仍因襲舊法，尚未達到新式工業階段，同時需要卻逐年增加，如裝置雜糧，郵件，沙石之袋，概須棕麻製造，在軍需上應用亦，所以中國有鉅量棕麻織品的輸入。在黃河沿岸，有時決堤時，居民因缺乏麻袋裝沙填堵，甚至將褲脫下以資急用，於此可見中國需要增加棕麻產量及新式製造棕麻品的一般情形了。

據一九三六年統計，中國產麻輸出情形約如左表。

國名	輸出量(一千公担)	數值(一千元)
比國	六	二五〇

法國	一二	四八三
德國	三九	一六六二
英國	九	三八二
日本	一二五	四九二五
總計(連其他)	一九七	七九六二

又據一九三六年中國火麻皮輸出情形，可如左表

地名	輸出鈔(一千公斤)	數值(一千元)
台灣	三六〇	三四
安南	四四二	五〇
香港	八七九	一〇九
日本	一三九三	一一一
暹羅	一九四	二六
總計(連其他)	三五六四	三五八

由右列兩表，可知中國的麻產，雖然對於日本輸入，還居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國輸出上，日本無疑地是中國最重要的主顧。我們認為中國供給日本的需要，在麻產上是比較棉毛來得有效多了。

中國產麻區域，在江西湖南湖北一帶，其品質最高的，係用以製造夏布，近年來夏布的銷路，很為停滯，至於粗質棕麻，因國內無工廠大量納進，是以大部分皆運往日本，又因缺乏競購情形，價格勢必低落，種植者既無厚利可圖，產量當然也就不會增加了。在中日戰前上海方面會有三個製麻袋工廠的計劃，大體都已就緒，旋因戰事停滯。我們認為中國如果振興製麻工業，其影響勢必使麻產增加，又因麻產增加，則輸日的數量亦必增加，我們如果觀察戰前幾年中，棉產激增的情形，就可明瞭了。

按麻莖的組織，中間為梗，外表為皮，中間一小部分，係有用的纖維。在中國出產各地，抽取纖維的方法，概用人工。每日所能抽出的，至為有限，所以獲得工資也很微。解決的辦法，在利用機器抽麻，即設抽麻廠於出產各地，運輸使，便利費用減輕，有人以為保持人工抽麻，

農民所得雖微，但尚有若干，如果利用機器，農民勢必絲毫全無，這豈是保護農民利益增加生產之道呢？關於這一個疑問，我們可以假設一個例子來說明。某農民可種麻五千斤，但其抽麻的力量僅為五百斤，而未抽絲之麻莖又無法脫售，因此該農民僅可種麻五百斤。又假設每斤麻的本身價值為兩角，每人每日僅可抽麻一斤，加工費兩角，則該農民五百斤之所得，總計為二百元。如果有抽麻廠的設立，則該農民可將抽麻的精力，用於推廣種植，將麻莖脫售，該農民五千斤之所得，總計為一千元，此對於農民當然有益，而且產量也能增加。至於收麻機關，在前須出四角購麻一斤，現因利用機器抽麻，除出每斤兩角予農民外，另加一角抽麻用費，斯每斤僅為三角，對於收麻商人，也有利益。由此我們可明瞭設立抽麻廠，確係一個最妥善的辦法。

關於棉毛兩項，總牽涉到改良棉種及羊種問題，至於棕麻只不過是推廣種植，而推廣種植也只有循着經濟自然之道。我們認為中國可允許日商在產麻各地設立抽麻廠，以收買棕麻，如此日本既可達到中國供給原料增加的目的，及營業上的利潤，同時中國農民也可增加收入，這當然是兩方有利之事。

其他農產物，如桐油，獸皮，獸油等物，也有許多係由中國供給的，但主要農產物——棉毛麻——的問題解決後，其他當然也可迎刃而解了。

關於海產問題，最主要的當然是漁鹽兩項。關於中國沿海漁業，著者頗欠明瞭，所以不敢作詳細的討論。想到戰前日本在華北有強行捕魚的事件，到了目前戰事中，日本更把中國沿海漁業，盡行奪去，於此可見日本需要之殷。我們認為將來解決的方案，必須遵行兩項原則：(一)中國在領海內，可允許日人捕魚，但須不妨害中國漁民的生產。(二)日人用新法捕魚，須顧及不致妨害魚種的繁殖。

海鹽是日本很人的一個問題。現在日本所出產的，僅數日本食鹽之用，至於工業上的需要，其數量約為食鹽的兩倍，則必需由國外輸入。日本輸入的海鹽，大都全非洲東部而來，其情形約如左表。(單位為噸)

，每噸計一千魁)

年份 日本產量 輸入量 台灣輸入量

一九二〇 五四二，七〇〇 三六五，四六五 一三，〇五一

一九三六 五一八，六八二 一一八二，一六七 八七，九七五

由右表觀之，日本在這十幾年來，本國產鹽數額，毫無增加，台灣的產量雖有激增，但是仍不足日本的需求，所以輸入海鹽的數量，在這十六年內，增高三倍，據一九三六的統計，輸入額較日本本國所產高出兩倍。現在日本化學工業在繼續增進中，所以日本對於海鹽的需要，自然也更為急迫。在戰前長蘆鹽區的存鹽，曾為華北的焦慮問題之一，自後由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批准由日商購買確定數量了事。日本需要中國的鹽產，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中國如何幫助日本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認為有兩個辦法。(一)中國各鹽場除供給中國本身需要外，其餘剩之數百分之若干，由中國售予日本，其價格的規定，須使鹽民得够成本及獲取應得的盈餘，此外尚須繳納國稅若干。關於國稅問題，中國政府可特別訂率低廉，以示經濟合作之意。但是日商購取此項價廉食鹽之後，在中國方面頗慮其重運來華，對於本國國稅上反生障礙。防止的方法，係在海鹽加着綠色，如此則海鹽僅可用於化學製造了。此種防止方法是否必要，這還得看實際情形而定。照這樣辦法，不但中國鹽民的收入可以增加，中國國庫也可增加收入，(不過國庫的收入，為數是不大的)，至於戰前日商訂購長蘆鹽，定價太廉，言是不妥當的。(二)中國將鹽田若干，租予日人，聽其自製。海鹽本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其產量的限制，無非是日光與鹽田。一年之中，只有一定時期，日光猛烈，可以操鹽，過此或因日光欠烈，或因時有雨水，就無法製鹽了。至於鹽田大小，影響鹽的產量，這當然是很明瞭的。中國如果將鹽田租予日人，必須不致妨礙中國鹽民的利益，如係新墾，當然更為妥善。

關於工業方面，中日兩方都有疑懼。在戰前日本有「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口號，在華北又有壓迫中國工業的事實，在戰爭時期內，當

然更不必說了，所以中國常常懷着日本不容中國工業存在的恐懼。在日本呢？恐怕中國工業發達之後，不但中國的原料不會再供給日本，日本的貨品無法再向華推銷，而且中國因此興盛起來，日本即感莫大的威脅，所以日本常常懷着中國工業興盛的恐懼。我們現在知道日本政府並無限制中國工業的意思，不過兩方的疑懼，如果不設法根本掃除，在中日經濟合作上，必然會發生許多障礙。就日本而言，如果認為中國工業發達之後，中國的原料將不再供給日本，我們只要看日本的棉毛來源，就可以了然了。英美是紡織業最興盛的國家，然而日本所需要的棉毛，卻是從英美而來。一個國家能有振興工業的力量，也才有振興農業的力量。美國有振興工業的力量，所以它的農業也發達，反之，非洲土人根本缺乏力量，所在工業既無法振興，農業也是落後的。即就日本而言，近年來工業更形發達，照理日本的農業因鄉民趨城，應形退縮，但是日本的食物反達到自給的地步。又就中國而言，近年來紡織業發達，然而棉產的趨勢，倒是從大量輸入而達到輸出。由此可知中國工業發達，其影響必係增進農業的產量，即日本利用中國農產的機會也會增加。所以日本關於原料的疑懼，是不妥當的。

中國工業發達之後，對於日本的工業，會不會發生競爭呢？我們認為這當然是難免的。據一九三六的統計，日本所製的棉布(本經漂染者)輸往中國東北四省的，約計兩千一百萬，直接運銷中國本部的，僅約三百餘萬。為什麼日本對東北的輸出，其數量會遠過於對中國本部呢？其理由即在東北沒有紡織工業，而中國本部則有之。由此可知中國振興紡織業對於日本國內的紡織業，其影響斷然是不利的。不過我們必須明瞭在紡織業以外的一般情勢。第一，日本的工業，並非僅是紡織一種，所以我們的觀察，應從全局着想，即中國工業的發展，對於日本整個工業的影響如何。如果整個的影響是不利的，我們就斷難責備日本懷着疑懼，否則日本即不宜單就一種工業着想，來設法阻止中國工業的發展。據一般的統計，戰前幾年中，中國工業有長足的進展，同時又在抗日高潮中，然而日本對華輸出，則反係逐年增加。日本對華輸出情形，有如

年份	數值(單位為百萬日金)
一九三三	一〇八
一九三四	一一七
一九三五	一四九
一九三六	一六〇
一九三七	一七九

由右表看來，中國工業進展，對於日本整個工業的影響，是並無不利，即云有利亦屬確實。

第一，我們要明瞭任何國家，都應不斷的進展，其趨勢是從農業到輕工業，再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如果日本壓制中國水久成爲一個農業國，而日本滿足於輕工業，這在中日間的比較上，日本固然可以永久保持優越的地位，但是日本和英美等國比較起來，也就會永遠墮乎其後了。我們認爲日本是決不會甘於落後的。如果日本變成重工業國家，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這便無法合作了。試問日本製造的紡織機，中國如何購買呢？所以日本想造成重工業地位，並想和中國合作的話，只有讓中國達到輕工業地位才行。

第三，日本輕工業所受的影響，也並不是沒有改善辦法。中國最大部分人民所需要的是粗布，而中國的棉花也只能製造粗布。現在中國西北各處，甚至十幾歲的姑娘，連褲子都沒有，惟有中國自己就地設廠製粗布，這種現象才有改善的希望，她們是決無力量購買外貨的。中國要想滿足粗布要求，恐至少非三十年的光陰不克，而在這三十年中，中國人因經濟狀況改善，對於精細布匹的需求，當然是繼續增加，而日本的一部分紡織業，也就可以在這個時期中，逐漸改製細布了。所以中國紡織業的發展，並不足以打擊日本，實際上中國本部輸入日本棉貨，在日本輸出上，並不佔最重要的地位，不過促使日本紡織由粗而細，至於數值上，我們認爲必然反爲增加。

第四，日本紡織工業，所遭遇的競爭，與其說是受中國的影響，不

如說是受在華日廠的影響，比較確切多了。自從馬關條約訂立後，外國在華通商口岸，有設廠製造之權，自此中國人工低廉及接近原料市場的優點，外國和中國已共有了，至於資本的雄厚，及技術的高超，則外廠較華廠又處於優越地位。在中國一方面，對於外廠製造，已屬皆見之事，只須無其他政治背景以壓迫中國工業，中國是決無反對之意的。

中日兩國在工業上一向是合作的。中國廠家常常聘請日本技師，以後因爲國交不睦，廠家才不得已解雇，至於日本在華工廠，雇用中國工人，一向有絕對的自由，不但中國政府方面，從來沒有設法阻止，即在社會上，也絲毫沒有認爲受雇日廠爲不當。至於日廠所製貨品，在運輸上，納稅上，及商標上，同受與華廠相等的便利及政府的相等待遇，這是週知的事實，無庸我們贅述。我們認爲依照馬關條約所賦予日廠的權利，儘可使日廠充分發展，限制日廠發展的，只是經濟上的自然之律，及日本自身不容資金的過分外流，而決不在方案的束縛。所以在工業上的合作，其增進的途徑，我們認爲端在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及中日兩國國交的恢復。

關於商業方面，可分爲兩點討論。一係關稅問題，二係內地經商問題。

中國人常常有一種見解，認爲中日發生齟齬的時候，其他各國增加日貨的稅率，係對於中國有利的行動。照我們看起來，恰適得其反。各國對日貨稅率增加，即能阻止日本對華侵略嗎？過去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又各國對日貨稅率增加，使日本經濟蒙受不利，即足使日本侵華失敗嗎？過去的事實又證明不然。倒是日本受了他國的排擠，統制中國市場的心更熾了。其他各國有強大的海軍或其他關係，日本不願輕易採取特殊行動，特別他們只是加稅，並非抵貨，而且常常候在中日衝突的時候，於是海軍就積在中國身上了。因此中國有修改關稅的必要，使日本確信中國市場，對於消納日貨已達到經濟的自然高度，如果日本要用統制方法，不但消納度不會增加，而且反爲減少，這樣才可以使日本不致專在中國方面着想了。

現在中國關稅，仍未達到自主的地步。依照九國公約的規定，中國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義務，所以中國對於各國貨品，僅可抽同樣稅率，而稅率的高低，又不容中國作主。現在各國對於中國領土及主權的完整，一無辦法，這是他們對於九國公約的義務，並不相負，然則中國爲什麼還要「機會均等」的義務呢？我們認爲日本應協助中國，達到關稅自主的地步，在中國方面，則應在不妨害中國利益原則之下，極力使日本處於優越的地位。假設中國並不購買中國棉花，我們爲什麼對於該國的棉布，不應課以較重的稅呢？又如日本購買中國大宗棉花，我們爲什麼對於日布，不應課以較輕的稅呢？

其次談到地經商問題。中國商人在日本，可在任何地點經商，至於日本商人在華，因享有領事裁判權及租界關係，營業範圍只限於通商口岸，至於內地則不能居住，所以不能營業。在從前德俄兩國，也有相同情形，德國因戰敗關係，俄國聲明自動放棄，所以兩國在華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取消，於是德俄人民也就可以在內地居住營業了。中國外交政策，是任何國如願放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中國亦即取消內地居住的限制。現在日本既願放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內地居住及經商，當然是不成問題的。

依照上述關於交通，原料，工業，一場四大問題的方案，我們認爲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完全可以達到目的，在中國也決可以切實做到，因爲這種方案，是合乎平等互利的原則的，我們更可以說在這種方案下，日本是絕無駐兵以防中國反悔之必要的。

有人說：本文中老說日本有什麼困難，中國應該替日本解決，又說是日本有什麼需要，中國應該設法使日本滿足，然則著者是不是忘記是中國人，專替日本着想呢？而日本把資源市場，供給日本利用，豈不是等於「養虎爲患」麼？著者的答覆是：爲日本着想，正是爲中國着想，至於中國把資源市場供給日本，正可以避免「被噬」之患，而且中日

水久和平的途徑也就在此。

日本是一國島國，它的人口在繼續增加中，資源既屬缺乏，市場又難以確定，而日本人民又具有克勤克儉的操行，在這種情形之下，向外發展是必然的趨勢。如果我們易地而處，其行動當然也是一樣，所以我們正不必用什麼「侵略成性」等類的名詞來罵日本，也不能說這完全是日本軍閥的慾望。如果中國是一個更強的國家，我們當然用不着替日本考慮任何問題，但是中國是一個弱國，我們就不容置之不理了。

日本對外發展，本有兩個政策：一係大陸政策，其對象爲中國；一係南進政策，其對象爲斐列濱，澳大利亞及南洋羣島。就日本解決人口原料市場各項問題而言，南進政策自屬妥善多多，然而南進的阻礙力，是英美兩國，日本自審力量，未必能克服，至於大陸政策，則係對付中國，雖然解決各項問題，決不能十分滿意，特別是人口問題，更無辦法，然則中國的抵抗力比較微弱，於是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抬頭了。

還有中國雖然是一個弱國，但是正在興盛中，這對於日本不能不說是一個絕大的威脅，所以日本必須趁中國方興未興的時候，迎頭攔腰，在戰前日本逼迫如此之緊，其理由即在此。現在日本實施大陸政策，既遭遇困難，這正是一個剝復之機。中國必希望日本幅員更大，更爲強盛，使日本對於中國的強盛，不致懷有任何的疑懼，同時中國必須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幫助日本的發展，使日本幅員更大，更爲強盛，這才是共存共榮之道。否則中日兩國惟有交惡到底，兩敗俱傷而已。著者剛才所說的答覆，其主旨即指此。

孫總理說：「中國的興亡，必須得到日本的諒解」，這是不易的至理。我們如果要獲得日本的諒解，惟有從經濟合作着手。依照上述的方案，中國既不必怕日本來利用中國資源來征服中國，日本也不必怕中國強盛起來威脅日本，而解脫成，中日兩國才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

論滬關貿易出超問題

張祖望

中國是一個依然沉淪在封建的農村經濟中的國家，這是無可給予否認的老實話，即使樂觀些說，近幾年來，在種種的環境需要與脅迫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已經抬起了頭，把中國從封建的農村經濟階段推進而至近乎現代的工業經濟國家的階段，中國的經濟已不盡是封建的農村經濟了。然而，中國的民族工業較諸任何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其程度的幼稚，實在是「相形見絀」。即就中國的民族工業本身來說，其出產量是遠不足夠供給中國消費工業用品的人口的分配，何況中國民族工業的技術遠不如人，因是促成成本有時反比舶來品昂貴，供求條件已不相符，價格又恆較舶來品為貴，這當然是無法避免先進的工業國家將其過剩的商品儘量地輸運到中國來。在帝國資本主義者，自然樂於從此積極地邁進經濟侵略的步伐，而在中國便在入超過鉅的壓迫下，日趨經濟破產的末途。這是已經由於過去的事實證明的實際情形。跟着，中國的農村經濟便徹底的崩潰，以至無法收拾。直到目前，我們能看見那一個鄉鎮的人民是豐衣足食的？尤其是自抗戰軍興，國土淪陷，饑成遍地皆聞的現在！

但是，事實却似乎無須這樣悲觀，據說在遭人民為饑寒而死亡載道的時節，突然地來了一個出人意表的「滬關出超」的好消息。中國的人民在入超的壓迫下已經受够了痛苦，今日有了出超的消息，這是該多麼的令人高興呢？然而，事實怎樣呢？出超是不是一件事實呢？即使出超是一件事實，那麼在上海已經淪陷二年，海關早已不為我們所有的現在，這出超對我們有些什麼好處呢？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在饑餓寒冷相煎迫下的中國百姓，聽到出超而感「興高采烈」時，來一個檢討的。這裏，我們先來檢視所謂「調整貿易成功」，因而獲得的民國二十八年上海海關貿易出超成績，茲錄上海海關民國二十八年貿易報告表如下：

月份	進口	出口	出超	入超
一	三九·四二三	三〇·四七一		八·九五一
二	三三·八八七	二八·九九七		四·八九〇
三	五三·一一五	二一·一八四		三一·九三一
四	五六·三九二	三一·九二二		二四·四七〇
五	七二·八九五	三四·二二三		三八·六七二
六	六七·四三〇	二五·六一八		四一·七八五
七	五九·〇二六	四二·一一七		一六·九〇九
八	六四·七五二	六〇·六七八		四·〇七三
九	四八·八一七	六六·七一	一七·八九四	
十	二五·八四五	七四·三三三	四八·四七七	
十一	二五·三二〇	九二·五五九	六七·二三八	
十二	三三·二二二	八二·九〇〇	四七·六七七	
總計	五八〇·〇九八	五九一·七〇三	一一·六〇五	

從上面一張海關貿易報告表中，我們知道二十八年一月份入超尚在八·九五一·〇〇〇元之鉅，但到十二月却已非但轉進了出超，而且出超的數目居然到達四七·六七七·〇〇〇元。總計二十八年的出超數是一一·六〇四·〇〇〇元。而這種情形看來，出口貿易因為「調整貿易成功」而逐日進展，進口貨物則因「調整貿易成功」而萎縮了，這現象對於民族工業的發展，已是無可否認了，因而中國的抗戰便也毫無問題了，然而，實際情形是否真如海關貿易報告表上如此說法呢？這問題值得我們來研究。其實，我們仔細考據一下，我國自開關以來，除了

歷一八七六年（即清光緒二年）全國對外貿易（包括一向有大量出超的東北各港口也計算在內）曾經有過一千七百萬元的出超之外，便找不出還有什麼真正出超的年份來。每年的入超數目狂漲不已，直到民國廿四年年底，海關便又發表了一紙出超的報告。兩個出超時間的相隔，整整地已有五十多年。一八七六年的出超問題，已因相隔時間太遠，無法證實其真偽，但民國二十四年的所謂出超，却有數可據，也因當時的情形爲我們所親自目擊，知道當時的出超，全是一篇毫無根據，且與事實全不符合的一篇謠言！也許我們將過去的所謂出超加以檢驗之後，提出了當時不與事實情形相同的地方來，與今日的所謂出超相提並論，也不難發現有同樣的不與事實相符的地方來。

據海關貿易報告中，我們知道民國二十五年是一個出超的年份，但是，祇要稍爲注意中國經濟的人，都知道民國二十五年中，不論是沿海以及長城一帶，走私是最烈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下，走私貨物的價格，當然是無法統計的，因此這鉅額的走私貨物的運入中國，便不爲海關貿易報告所記載。這樣，一般人也就無法指破這所謂「出超」的理論。但是，正當着這「出超」高唱入雲，給粉飾太平的一般流俗經濟學者們拼命鼓掌喝彩的時候，上海日文日日新聞報上發現了一段很詳盡的關於私運的記載。據該報所載，二十四年份秘密輸入中國的貨物價值經某海關從業員專門的計算，等於二十四年正式輸入總額的三成五。我們照這種情形來估計，當年海關輸入總額是九億二千萬元，那麼秘密輸入中國的走私物價，至少也在三億一千萬元左右。把這個海關貿易冊上所不會記載的數目加入海關所據爲報告的數目上去的時候，出超在那裏呢？就根據這種情形，目前的出超當然也是一個疑問。原因是自上海淪陷之後，海關根本就爲日人所操縱了，同時除了海關的被操縱之外，還有大量的物品跟着日軍的行跡所至，不經過海關貿易冊的登記而直接流瀉到各淪陷區域裏的，如果把這些跟隨着軍隊直接輸入中國來的貨物作一個統計，這個數目加到目前海關所登記着的進口貿易額三三·二二二·〇〇〇元之上，那麼無疑的就可以給這出超的宣傳一個有力的當頭棒喝。

這當然是無法避免的事實。這是說明海關貿易冊上所報告的出超數目是不可靠的。

其次，即使海關貿易冊上所有的報告盡屬詳實不虛，出超確是事實；但是，我們還是不能不躬白地把出超就當作進口貨物日減，中國民族發達的證據，因爲出超依然是有着正和負的意義。現在我們來檢視一下，這一次的出超，到底表示了些什麼意義。就根據海關報告表上的所謂出超，從進口方面說，在出超期間減少最多的是糧食。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促成出超的一個原因是糧食輸入的衰減。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促成出超的現象是暫時的，在目前兵慌馬亂的作戰時期裏，中國到處都形成了有田無人種的局面，糧食不能自給是必然的，因此爲維持民食問題，大宗糧食的輸入絕對不是長時期停止的。等到這個問題一旦解決之後，出超，同時幻滅了。再從出口方面來說，根據海關貿易冊上的報告，出口物以棉花桐油等原料爲大宗。大宗棉花出口並不足以表示中國棉產的增進，其實在原因，係各地紗廠被毀，中國國內用棉數量銳減所致。這對於中國的經濟前途有什麼好轉呢？所以有人對中國的出超作過下列幾點批評：

一、貿易出超，海關關稅當然減少收入。但是關稅是中國內債外債的担保，現在已經形成出超的局面，關稅短少，結果便一定造成債信動搖。整個金融亦將受其嚴重影響。因此，出超在中國非但談不到振興事業，反而因此促成了財政上的許多困難問題。

二、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農村經濟國，所以輸出的貨物都是些賤價的原料。但是這原料一旦經過先進的工業國的改造，便是高貴的製成品給大批的輸入中國來，以此原料超過許多倍數以上的價格賣給中國人，在一轉手之間，中國反因出超而損失了！換言之，因爲原料廉價出賣，輸入工業品則價格抬高，這種不等價交換，更促成了中國農村經濟崩潰。

以上兩節所評，我們覺得確是扼要而且切中時弊。因此我們對目前的滬關貿易出超問題，難道說可以完全超然於這兩種批評之外嗎？如果

目前的出超依然不能超於上述的兩說之外，那麼出超非特無法從經濟上幫助抗戰的成力，反而是使中國經濟日趨窮途！所以，我們覺得出超是否為一種可靠的事實，當然懷疑，即使是無容置疑的事實，也根本不見得有什麼幫助於目前的國民經濟生活，對抗戰的政幫助當然更加談不到。但是，事情却是無獨有偶，當着一般流俗的經濟學家正借據着海關貿易冊上所報告的出超大作其觀的宣傳時，英帝國主義所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竟大煞風景地宣佈禁運及限制非英屬國的貨物入口。中國為非英屬國，當然是在被禁之列。查其限制輸入海峽殖民地的貨品計有七十六種，禁止入口者凡一百三十六種之多。其宣佈禁運入口的貨品，其關係本市工業或商業之大宗者，計有三十一種。

限制輸入商品，與上海有關者統計又有二十三種之多。以過去情形來說，上海輸往南洋的廠家製品，平均每日約達二百萬元之數，今海峽殖民地政府業已宣佈禁令，而其禁止與限制的輸入品又與上海有關係者如此之多，民族工業之受打擊，自然是一件無法避免的結果，但是出超又將怎樣可能保持常態了呢？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中國沒有出超，尤其是在戰爭的狂潮中，一切都趨向破產毀滅的末路的目的，祇聽見大量軍械用品的輸入，以及大量的商業品跟隨着日軍的行蹤，無需經過海關而直接傾瀉到內地去，所

太平洋現勢的

中國一向想把歐美各國在華權益作為引誘歐美各帝國主義者對日本實施制裁，這是一個極端需要即刻矯正的觀念。中國應以中國的利益作為奮鬥的目標，絕不該以帝國主義從中國繼續獲得利益作為號召，去乞憐於列強。我們該明白歐美各國在中國獲得的特殊權益，全是中國的損失，不論是經濟，抑或是政治，都不能例外。所以，列強即使毅然為其在華權益而採取了制裁日本的斷然手段，且因而繼續維持在手的既得的權益，則中國的損失當然是同樣繼續其被剝削的痛苦。同時這痛苦的程

以海關的貿易報告表上告訴我們的出超是不可靠的。根據海關貿易報告而大加鼓吹說：「調整貿易成功」的一般宣傳家，無非是這利用這一塊烟幕來 移人民對抗戰的厭惡的心理。其實，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反映着虛無飄渺的亦市登樓。任你怎樣說：「中國是出超了，洋貨漸漸被我們的國貨 擠了，以後的一切經濟上的權利奉讓是不會外溢，相反地我們中國到今日也可以向海外去賺一筆鉅款來發展自己的工商業了。」而事實上我們却無法否認因為繼續抗戰的緣故要大量地批購外國的軍火，這當然是無法不將中國的財物送給外國人。因為戰爭的關係，各區工廠無法生產之外，又加上海峽殖民地政府的禁止輸入的情況下，無從獲得出超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至於農產品的出超，自抗戰發動之後，淪為戰區的生產面積的廣大，出產之銳減也是不容諱言的，日給尚且不足，安有剩餘可以輸出？從這些事實中，我們沒有理由可以強調出超在目前上海是可能的。即使退一步說，出超確是事實，那麼於國民經濟生活又有什麼補益？物價狂漲暴縮，人民受盡饑寒的苦楚，出超又與我們無辜的窮苦百姓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們是不需要這些粉飾太平的空言，我們需要的是和平的生活環境，在和平中奮鬥，在和平中救中國！

剖視

陶玉麟

度是否將日漸減輕，這個問題的生死權是操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中國是無權 問的。但是，根據過去的事實，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與弱小民族之間，如果沒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是決定不會有同情的。所以，消極方面來說，日本從列強帝國主義者手裏奪下了他們對中國剝削的權利；換一句話說，就好像一個傭工換了一個主人。從前被人剝削，現在也不過被人剝削。不給這個主人剝削，還去逃不了要替那個主人剝削。剝削者固然是已經更換了，但其被剝削則依然如一。要是說被某個主人剝削較

主某個人來對前比較好，而不知調整國際關係，爭取整個許離被剝削的地位，這是祇有共產黨，這史太林所蒙養的「奴才」纔這樣看法的。所以，在中歐也祇有共產黨才不顧羞恥的說：「中國要是亡給日本，不如亡給蘇聯」這種奴性十足的話。這一種準奴隸的表示，真是羞辱了大中華民國的文化歷史，非但這種奴隸性招來了中國的不幸，就是太平洋問題的發生，亦何嘗不是種毒於中國共產黨這種無恥的投降蘇聯的盲行所召至？今日之言太平洋問題者，只知日本之侵略中國足以召至帝國主義者爲其奔華權益的被破壞而生嫉妬，不知世界之有所謂「反蘇陣線」的存在，真如俗言所說：「瞎子摸象，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祇知「日本北進以攻蘇聯，」而不知歐美各國，無一不期望於日本之進攻蘇聯，「其可哀也。莫甚若是」了！

誠然，日本的侵略中國，其將破壞歐美在華的所謂「利益均等」的要求，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歐美各國的外交對象，却不單純地祇要對中國的「利益均等」；日本破壞他們在華的利益均等固足爲各帝國所憂慮，但是這并不是他全部利害的得失，情形就鬆懈得多了，所以，太平洋問題的癥結，并不在日本之破壞歐美各國的在華利益均等，而是在世界反蘇陣線的勢力膨脹。中國之所以爲日本侵略，世界各國之不惜犧牲在華的「利益均等」要求，而一任日本爲所欲爲，其最大病源就在中國共產黨的公然表示其願意附庸於蘇聯的邪惡的言行。凡此種種，我們無庸多所贅言，試觀今日所造成的太平洋現勢，足資證實而不容置辯！今就以地理上觀察與太平洋有關的國際關係。以太平洋波濤所及的海岸而言，一面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儘量地發揮着他的經濟富力，以太平洋爲目標而不斷躍進的美國。一面是飽蟠西北，建設社會主義，企圖赤化世界，更進一步以打倒英、美，法等資本帝國主義爲目標的蘇聯共產主義國。一面是英帝國屬地及自治領如加拿大，緬甸以及英屬南洋羣島，一面是法國的屬地與市場。最后，還有躍登世界強國之林，虎視眈眈的日本，和帝國主義者最大的投機市場的老大中國。總之，太平洋誠然是列強角逐的戰場，然而，情形也就因此愈形複雜了。不

過爲了要指摘出靠列強的維持均勢來生存的理论的謊謬，我們是不能不檢討太平洋的現勢，以駁斥一般對太平洋認識不清者的理論，及指示一條中國應如何適應國際環境來轉移自己的地位，獲得東亞的永久和平，建立中國自由，獨立，平等的基石的道路。

要明瞭目前的太平洋的形勢，我們決不能忽視了「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國際形勢。日本發動「九一八」，其行動誠然與「門戶開放」爲武器，想利用經濟確立其在中國之霸權的美國有所抵觸，但是，美國卻存着更大的希望，而忍痛犧牲一下。這希望是什麼呢？這便是希望能因滿洲與蘇聯的接近，而趕快發生「日蘇戰爭」。換言之美國祇望日本能够實踐反蘇的計劃，美國是願意犧牲其在中國的權益的。這與表示出在我們眼前的，是美國反蘇的具體要求，乾脆地說，美國祇要日本能够反蘇，美國是無不願意犧牲的。

其次，英國對太平洋問題是採用了什麼姿態來應付呢？我們誠然不能諱言英日在太平洋上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最顯明的是東亞通商以及航運業上的日英競爭，就以對華投資與貿易上，日本也是英國的對手，然而，雖然如此，但在日本的後面，有力的支持者，却還是英美等國。在表面上分析這一種現象，似乎未免太矛盾了，可是，一經觀察其癥結所在，其如此處置太平洋問題，却并不是沒有理由的。理由是什麼呢？從簡單的說來，大略的可分下列幾點：

- 甲：代表重工業以及貴族的保守黨所挾持的英國政府，無時不在考慮對付世界巨敵之一的美國之必要上，深覺有聯絡日本在遠東強化其殖民地之必要。（這世界新舊兩大帝國作全幅的抗爭，是很顯明的，雖然，在表面上是極和緩，而實際上是很堅韌的。這種事實的證明，H. Fox 所著「太平洋之支配」一書中，曾經這樣說：「太平洋的爭執，在英美之間展開是極明白的事實，兩強國都要獲得太平洋，而實際上誰也不能佔有。」）
- 乙：在日本建立反共產黨國家——蘇聯的根基地在滿洲這一點意義上，英國非但覺得需要，而且高聲喝采的。這是「九一八」事

變之後，國際聯盟袒護日本的對滿洲侵略的最大原因，換言之，英國在這一點上，是和美國有些類似，祇要日本能够和他採取反蘇聯的同一步驟，他們未始不願意把在中國獲得的權益，當作代價去換取消滅共產黨赤化世界的兇鋒！

丙：爲察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各地的赤化運動，利用日本對華的軍事行動作先鋒是最合算的。原因是一方面既可作肅清蘇聯在遠東的赤化勢力，減少資本主義在遠東的阻力。另一方面，當日本疲敝之際，正可趁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樹立其在華的領導權。甚或實施共管中國的政治活動！這事實可由目前英國對中國的抗戰所採取的那種玩弄手段予以證明！——在目前，英國對中國當然是極力的慫恿，期望着中國能不顧一切，抗戰到底，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暗地裏援助日本的侵華，這種事實是無法諱言的。

綜合以上三點而觀，英國對太平洋問題的態度，在中日戰爭中，當然不會全然置諸不問，但是，他期望於日本會打倒蘇聯，却又不禁站現旁邊叫好！雖然有損他的遠東權益，也在所不惜！這無疑地是具體的表露着祇要是反對蘇聯，吃些別地方的虧是不在乎的！

再其次，談到法國在太平洋上所採取的政策這問題。誠然，法國在太平洋的利益關係比英美日是要相差得遠了，但是，因爲安南以及太平洋南方羣島等重要殖民地及在中國的利益倒也不算小，同時，因爲法國對蘇聯的嫉恨，便就促成其無限期望日本侵佔滿洲後，滿洲可以立刻變成滅亡赤化的戰場。這種事實，都可以從他供給日本軍火以及對滿洲國之借款等加以證明。除此之外，日本擁護法國在國際聯盟的領導權，同時國際聯盟的援助日本的侵略行動上，也同樣足爲鐵樣的證據。

統括以上所述英，美，法三國在太平洋所採取的是同一的反蘇姿態，已是無可疑義的事實了，其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是無法消滅的，何況帝國主義者無不認爲消滅赤化是爲解決經濟恐慌的最高方法。在這一觀點上，大家都認日本爲最適宜的先鋒，而今日的滿洲就是最好的反蘇陣營。這一點就是日本所以能自由軍事行動的一種環境！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每在帝國主義者對其有所不利的時候，即要對蘇聯稍作輕微的挑釁，列強主義者便在他的反蘇姿態下，無形中就緩和了。所以時至今日，各國在華利益之被破壞，誠然是一件事實，但是，日本是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下，却非但不因此得罪英，美，法，法等國，反之，却得着無數的援助。從這裏看來，今日斤斤然以在華權益之得失來誘惑列強的對日制裁，這是無可能的。而要轉移今日的國際形勢，企圖獲得英，美，法，法等國的同情，且促其一反袒日的態度以助中國，便應該先與英，美，法等採取同一的反共產的姿態。如果中國採取了剷除赤化勢力的行動，這當然是援助了英，美，法。赤化勢力在遠東既無法進展，他們便會注意到遠東權益的確立問題。到了那個時候，不用中國大聲疾呼，列強對遠東的問題便自己會注意起來，因爲這時候才是他們真正關心東方的永久利益的時候！

最後我們感到，太平洋問題的中心，是如何剷除共產主義的膨脹，如何消滅赤化毒藥的延蔓，而不是僅在中國的利益均等問題上。不錯，我們也不敢否認列強對中國的利益均等問題與太平洋問題是有聯繫的，但在列強的心目中，這畢竟是次要的問題。否則，英，美，法決不會情願犧牲其在華權益，去希望日本會樹立起堅強的反共陣營！所以，今日中國要獲得國際間的諒解與援助，唯一應走的路是反對蘇聯，與英，美，法採取同一的反對赤化世界的共產黨！

譯著

致汪精衛先生書

尾崎秀實

因蘆溝橋事件中日兩國開戰以來，歲月如流，不覺兩年有半，東亞民族，時瀕寶貴之血、破壞日多，窮乏次第切身，則未可諱言者也。鄙人最近得有機會，就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兩國之關係，曾作比較精密之研究，以冷靜之頭腦，作客觀之考察，以為中日此次之悲劇，有不可避免者在也。良以「業」已造深，欲行消除，以期達到中日相互不可動搖之理解，鄙人深信非推翻若干腐爛之「中日親善論」與「中日提攜論」不為功。

本來我日本人並無嫌惡中國人，當戰爭開始之時，我日本政府即曾宣言，此次用兵，並非仇恨中國之民衆，不過懲罰誤用政策之蔣政權而已云云。鄙人以爲此種宣言，係日本國民中堅一層真實之心境。第以鄙人僑居中國，爲時頗久，故觀感亦較常人爲親切，以爲中日雙方前此彼此未曾敬愛，則爲不可掩之事實也。不過吾人須知在雙方對峙之下，拳打脚踢，累日經年，既已無可如何矣。則剝離必復，俗所謂「打出知己來」者，寧非事理之當然歟。即此一點，得非爲「新秩序」之重要基礎歟。

夫對於「東亞新秩序」之全般表現，及所謂「東亞協同體論」之一定主張，在中國方面，似未十分瞭解。固然在於此種想念之中，可從各種角度，納入各種內容，形成複雜之體制。不過此其本體，儘有極深之理想事物，貫串於其間，此則吾願中國有識之士予以諒察者也。此無他，即一面包含壯烈之情緒，一面顯示昂昂之狀態者是也。

吾人不可不想法謀亞細亞之興隆。夫欲謀亞細亞之興隆，不可不先

從復興中國着手。此其事業，固須一方繼續戰爭，一方與之並轡而行，此其艱苦，寧能以言語形容耶。今閣下已爲此事挺身而起，分担任務矣。閣下於答復西園寺公一書中，自言不顧一切，以中國之愛國者爲己任，是則然矣。鄙人對此不能再贊一辭矣。

閣下與我日本方面折衝之中，當有莫可如何之艱苦，此則不難想像得之也。觀中華日報之論調，一則曰「日本征服中國爲事實不可能」，再則曰「近衛聲明，決不以中國爲戰敗國，而有所強迫要求」，可見閣下欲求國人諒解，費盡心血，決非假惺惺者所可竊比也。

我日本民衆之心境，當然亦極複雜。關於此節，以爲自熟悉我日本之閣、始，以及在閣下周圍諸公，如非加倍注意，當亦無從知之。鄙人前日在某處談話，涉及「青天白日旗」問題，來賓之中，突以質問，「汪精衛緣何如此」或「青天白日旗」云云。并因問者係一篤實之人，令鄙人不便率爾措詞矣。即此一端，可以想見我日本不易了解閣下等現在所持之政治問題中，含有根深蒂固之民族問題者之了解閣下等現在所持主張之如何困難矣。

自前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閣下發表宣言，彷彿投一炸彈，以驚破世人之胆後，業已一年於茲矣。在此一年之中，驚風駭浪，洶爲閣下多難興邦之秋，而閣下所懸和平救國之願望，即亦前程遼大，有待今後努力者正多。

閣下所領導之新政權，想當不久可以臨盆。關於此節，世人雖有種種悲觀之論調，但在鄙人則始終以爲水到渠成，決無問題者也。雖然新

政權之產生，固已決無問題矣，不過吾人應當明白，如謂新政權成立，中日糾紛，即可迎刃而解，而未免有近於見卵而求時夜之觀。故就處理事變之方策而論，若專心一意，只期待於新政權之產生，則亦難免有類於穰田者操一豚蹄而祝五穀滿家之謂焉。

故鄙人意見，以爲欲求中日問題之解決，歸根結蒂，非求中日兩國

共產主義宣告破產了

Nathaniel Peifer

(一)

蘇維埃變換陣線後，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的結果如何，以後的數年中是難於估計的，但是畢賓特洛和莫洛甫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了所謂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蘇維埃已經把共產黨宣告破產了。自從這天起，我們從一九一七年起所知道的有組織的共產主義當作世界的經濟工作，是粉碎了。而我呢，從廣義的社會眼光看來，這是一樁純粹的幸事，因爲在我們時代中，來解決經濟問題所應有的重累，而今是解放了。我們現在能够把各種經濟問題的價值重新來研究，而不必顧慮到近年來所灌注的不適用和不需要的刺激，所以我們研究這問題而得到較好的解決機會，這事實是人人所歡迎的。除非是這經濟爭端中執迷的極端派，那自當別論的。無疑的這些泥於一個「淺的反動派」，亦要感到不幸，因爲共產黨是他們頂有價值的資產——可畏的榜樣和威嚇，但是史太林把他們的一切剝奪了。

從永久的社會眼光來看，蘇維埃在這次歐戰中所佔的地位，或者在這篇文字付印的時候，歐戰竟由談判而結束了。這都不成問題的。俄國或者守中，或者抱着消極，或者把資源供給德國，或者與德國的軍事聯合起來，或者結果竟與德國敵對，亦均不成問題的。蘇俄是不能挽救社會革命上的根據地，和她的標準地位來做經濟新秩序的模範

民族達到根本諒解不爲功，此所以鄙人等對於閣下爲此事之實踐，投杖而起，不替深表敬意，并祝閣下之真意，在全國民衆中，獲得澈底之了解與擁護之不在這也。

(原書於一月五日在國民新聞發表，張嘯譯)

。假定歸功於最高蘇維埃的政治上新權謀主義能够獲得完全成功，亦是無能爲力的。

假定史太林果真打算把西歐的兩方被迫，而爲毀滅的戰爭，再把蘇俄的努力，從戰爭毀滅的當中，來作歐洲的主人翁，表面上至少是實行純粹的共產主義的最策略時，但是這並不能肇始世界革命。雖然史太林或許會成功，而使歐洲成爲革命的組織，以現在蘇俄作爲模範，但這個以她自，爲首腦的新政局，並不能成爲世界新局面的中心。不論她如何標榜，不論係何種經濟及社會組織，但結果決不能爲馬克思或列寧所能承認的社會或共產組織。會被美國銀行公會所阻咒的這種新局面，無非是權力萬能軍事化的國家主義，在最近的表現他是一個巨大的亞細亞獨裁主義，爲其首腦者是一個霸王，左右爲親衛兵，諸哨者，情報者，奇性質者，以及一切新式的附庸。自屬於亞細亞方面野蠻的官儀，這種制度必爲馬克思列寧及其他亞歐人士所憎惡，因爲他們是被文藝復興及十八世紀以後的傳統思想所訓服了的。

不論戰後歐洲與蘇俄的關係是怎樣，列寧把馬克思的主義所養成的共產試驗，是死定了的。假使說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那天，這種試驗被史太林滅掉了，在歷史上說起來，是並不確實的，他不過加以最後一擊罷了。在過去的數年中，本已顯著的在逐漸死亡了，或者心並沒有生存過。但是生出來，就是一種怪異，注定了壽命是很短的。假定

馬克思現在活著的話，那近年來蘇俄國內的生活，一定是受不住的。在史太林清黨運動發出第一顆子彈時，他老人家必感覺到安慰，他起初便須感覺到不幸而想擺脫了。所以共產國際，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名稱，「國際」這二個字，就是一個欺騙。假使曾經存在，現在却已死了，西歐共產黨徒的信心，除了未經改造過的少數，已永劫不復地粉碎了。雖有些地方，還可以集合起來，但是不能持久的。倘使蘇俄能夠得到歐洲的治權，大多數老共產黨徒，必感到冷淡，或持着異心，但在威武之下，像史太林的異國人民一樣會被屈服的。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獨裁者，但是這個獨裁主義，並不是他們所信仰而曾經犧牲過的無產階級主義所產生。

從莫斯科政治權謀主義下，所提出的辯論，卻大都是表面的。聽來是深具誘惑性的，却未嘗取效，就是馬其米本人所提出「教訓」，亦是宣傳得過份。史太林或許亦知道他無非和馬其米在玩弄着，但是不像社論譯員和批評者的那樣確實罷了。希特勒是很明瞭，英、亦未嘗不明瞭，不過好好預謀着「看棋式」的「謀」。在國際間是很少結果的。歷史家在事後方才會探試出來這些。史太林首倡的「對」，因為太簡單，太容易辯別的緣故，是沒有相當成功的可能，和去年張伯倫假定的「對」，使德蘇互相猜忌是一樣的簡。一樣的明顯。

這個時候，當嫌太早來結論史太林「手腕」，是使英法兩國自掘他的坟墓。假使有人對於高深政治倫理，加以猜測的話，那很好的學理上的辯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開始的戰爭，不過是長期「對」的開始，但在最後的戰爭中，英法德却會聯合起來打着蘇俄。英法因政治關係，在初期戰爭中，或不願盡全力來打倒德國，因為後來德國改組成爲對付蘇俄的先鋒。的確，史太林現在的行徑，已實現了「早預」到自共產黨口說——就是歐州主義國家結合起來，來對付「早預」的危機。將來比「驚人的事」是會演出。一部份德國的份子，會在希特勒的「私底下與英國談判」，使德國來參加這種結合的。

這慘酷的外交路線，最後究竟怎樣，和權力究竟屬誰，蘇俄和社會

革命的關係是一樣的結果。換句話說，根本就毫無關係了。不論蘇俄的假定計劃得到收獲，或她竟在軍事上如歐洲的主人翁，她對於國際共產的領導地位，和國際共產的本身，均完結了。我會經說過，這二年來悲慘的經過，這明明是一種收獲。單單照這個事實，假定歐州完全結束了戰爭，而預言着西方文明將「來一個戰爭」被摧殘，不致實現，那末將來社會的進展，不定很可觀的。最近二十年來，社會進步的重大障礙，將就此消除，並且消除得很容易——是自己來消除的。

(二)

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可以說西方並沒有多大的社會進步，除了戰爭以外，現代人民所受到「責罰」，更是經濟的不景氣。戰爭是否和經濟不景氣有休戚相關，或者戰爭是經濟不景氣的因素，現在不必討論，但是經濟不景氣，是一種病態，一切科學的進步，不能制服牠，或管理牠。歐洲自從一九一九年起，美國自從一九二九年起，是在半沮喪狀態中。在兩個大陸裏面，並沒有顯著的改善，或者用什麼方法或應用什麼原則來求改善的途徑。有人批評西方文明，以爲顯著的經濟改善，大半就靠着近三四年來重整軍備之賜，這就是說人類是靠着製造軍備來換取麵包。此外人民的大部份，都是失業，都缺乏營養，必須靠着政府的金錢及慈善機關的賜予來生存着，希望是很少的了。所謂文明能在自然界中找尋最深的秘密，和克服至微的分子，不能使人類衣之食之。

經濟不景氣的原因是很多，而又很複雜的。我們此地不必討論。我們要特別提出的，就是怎樣去處理它，和這類的企圖，是沒有結果。假定物理學，化學，機械工程的種種問題，同樣的沒辦法，恐怕我們根本說不會有飛機。我們，須拿手工具來耕田，而遇到白喉和肺癆病的時候，只好坐以待斃了。怎樣去尋求和尋求的結果，固然不歸於一端，但一樁很明顯的，就是沒有認真去尋求。事實上對於社會上有權勢的羣衆，是有利益的，所謂現狀，未就包。着近代社會裏可怖的已賦予的利益，而這種現狀內得有利利益的對於共產黨腐敗的力量，亦很重視的，但被

重視的不是社會和共產的學說，乃是有組織的共產主義，以及它不適用、不靈驗的冗物，和精神治療般的「藥物」，使一班不受特殊利益影響的，和一班願意犧牲眼前利益，以換取遙遠及普遍的好處的人們，都被「定而不動搖」了。

凡有經濟建設力量的人們，共產黨必定把「一條青魚」來勾引他們。這樣便以他們利益關係來阻礙經濟建設了。再則並不因為經濟原理或程序的緣故。共產黨却排除了一切力能改善或建設的人們，這樣蒙昧主義者反動者和真正守舊派，都把棍子攪了。總之，對於失業救濟專利的管理，私有財產的限制，有所作爲時，不啻是討論「權去廢除上帝，怎樣去剝奪「沒來」當作摩根公司代理人，法律上的保護，和廢除「項式定理來當作「勞工羣」被奴視的工具，由很容易的辦法，反動派主張，向工會集體討價還價的勿當，無異於主張無神論檢查沙士比言的論文，和毀滅家屬制度，這樣使集體討價還價喪失了信用。

西方的人民，在現下經濟制度裏，雖已被逐了，但是他們對於存在的經濟制度的信念，却並未動搖，這「現代的怪現狀。十年來美國失業的人，大約在一千至一千五百萬中間，但是共產黨把棍子攪的，却佔極小的少數，似單在西方任何國家當中，經濟的衰落和共產主義的生長，却並無多大連繫的。凡社會的發展，有利於共產主義擴張的時候，共產主義反而後退了。在一九一九的那年，比較二十年後却很「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因為那個時期經濟逐漸的腐化了，不過共產主義的「衰落，却不能把法西斯主義的膨脹來解釋他的原因，反之法西斯的所以膨脹，却一部份因共產主義失敗的緣故。

現代不幸的現象是一大部份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在社會上應當作領導的，在政治上，可惜是沒有歸宿。假定這個字句還未失掉它的價值的話，我所說的，就是這班「智識階級」。現在他們是可憐得很，因為從智識與情感方面，講他們是不中用了，因為外面的環境，不容許他們，這是連自己都不能來管束的。雖然他們知道，們自己的能力，和怎樣去發揮它，但是他們沒有去處。拿他們視作一羣，姑且不必個別討論，他們

感受到因不順利而神經苦悶，不能發揮他們的力量，他們對於忠誠和活動，是缺乏信心和集中點，他們很明白現代經濟組織的缺點和失敗，而有改良的必要，有許多人具有清楚的見解，怎樣才是補救的方法，或者從那一部原理，這些方法所自來，他們願意把他們的意思，見諸實行，但他們不能有所作爲。他們是沒有機關和媒介所。以不得不在消極或變於天命的空虛中隨波逐流了。

這一種現象主要的事實，却因為現在的經濟制度，是預先被共產黨徒所出空了一部份，是因為共產黨有勾引的能力，另一部份因為極端派常常會驅逐或禁止中庸份子，因為不委托於極端派的人們；是沒有地位的，大部份不爲利己的羣衆，其主要的目標，是在找尋生存的機會，他們需要的是職業，有充分的收入，可以無憂無慮的生存下去。再有較短的工作時間，使他們有機會來享受娛樂。職業有相當的保障，工作得到滿意，工作時間待遇相當圓滿，他們不願意在「現時代的前面，來放棄提高生活的希望，但他們不願意廢除上帝，他們不要驅逐家庭，他們不願把生存的地方放棄忠誠，他們不願把地理爵士音樂和「劇混爲一談，他們對於主義有健全的憎惡，特別的是在美國，他們並不真正的把無產獨裁方式來推進，因為他們雖然在演進當中，將成爲無產階級，但是他們自己並不加以承認的。他們亦許是對的，他們亦許是不對的，但是二十年的共產黨徒的呼聲，他們是冷淡置之。他們對於一九一四年以前社會民主政治的信條，却歡迎得多，雖然窮苦階級的剝奪，似不無稍感悲慘的。

(三)

講到智識階級，因為共產黨的所以爲共產黨，係因他們的本性，所以共產黨的黨籍，是會被拒絕的。他們的觀察，以及思想的結果，有時認爲馬克思的分析，是有效的，或者至少覺得資本主義或放任的經濟組織，並不是不受歡迎，實在是行不通的。但是從開始終至於綜合共產信仰的硬性固執獨斷，以及其附屬的精神錯亂，是沒不過的陷阱。共產黨

的公佈成績，是對於黨的信心並不能使其信徒公然宣佈他的信念，及對於社會有所供獻，反之却是放棄智識的自主和拋棄自尊。

一 受有教育的幾個，他們曾經信仰共產的，大都發現他們的失意，而出了黨了，而被黨驅逐了，或竟——我很適當的用着宗教的儀式——把鈴書和臘燭，執在手中，而公然宣佈出黨了。「安特」其特是一個好榜樣，而歐洲和美國較不著名的人，正多着呢。自從經濟不景氣後的第一個時期中，會有許多美國的教育家和文人，自從新發現的經濟問題，都加入了共產黨，這些文人多心中激蕩慷慨陳詞，而道輩迂士的集會，便組織許多新的學會。

但是這是短命的，一個一個的都回來表示悔了。這並不是一反他們的信念，却是憎惡新的較憎惡舊的來得多。他們不得把逼迫他們接受的糧食來消納下去，這是各國一致的教訓，例外的只限於有些人把教育和盲目的信聯合起來，有時竟傾向於「討克末大」一般的安閑。

共產黨對經濟信念是分離的，高實上，是視作並不重要的，這樣說法，並不過分，因為抗拒社會哲學成份少，而精神病態的現狀多。

假定人們不預備放棄個人立場的話，那末對於共產黨的一切口號，特別是所謂「黨線」，必定受不了的。倘使你相信以社會來管理經濟的步驟，比較放任主義和限制利益來得，為什麼你必定要擁護「羣衆動物學」或者莫斯科新近倡儀的馬克思派優生學呢？為什麼屬以利沙伯時代的編劇家，把「因特克斯」一角當作一個「布爾喬亞」近代的音樂家，因為缺少無階級觀念而會擁護的呢？為什麼你不能稱「人民」而只好說「勞動羣衆」呢，為什麼教員會講，而你只好意講，不得不認爲滿意呢？

我想我所說的是確實的，假使我說共產黨來測驗你的信仰，你本身相信的，倒不甚重要，而亂用「的語言，倒甚重要。不 具有深思的人士，他們對於經濟信念，怎樣，這種情形實在是在此不下的，他簡直不明瞭與經濟關係，和經濟組有什麼關係。

他尤不能下嘴的，即所謂「黨線」，把它實際翻譯起來，就是說

教你在星期一相信什麼，到了星期二便教相信絕不相同的，以後就教把你二方面的信念，當衆宣佈出來。近來從共產黨徒所得到的這種理論，實在並不是偏私的陳述。起初民主政治當作一種騙局，而社會主義者進出黨新分配主義者，及這一派的人物，都叫作「社會法西斯派」。這樣誰是社會法西斯派，是叫定了的，因為除了這樣叫法，是沒有別種了。後來德國反動發生德意簽訂同盟，而莫斯科就製定了和平陣線的名稱。

從這樣下來，民主政治便成了思想正確的人們的宗旨了。美國獨立宣言，就變了美國共產黨徒神聖的證書了。而在幾個禮拜前，大量的屠殺他同志，自稱大傑弗遜的，史太林就公佈了民主政治的憲法，這樣民主政治，是視爲無上寶貴的，而集體安全爲思想純正的國家所應當追求的。至於國際聯盟，是當作欺騙它的會員國，是帝國主義的強盜結合起來而與蘇俄來作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蘇俄却是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國家的保護人，但是中國人想把在帝俄時代所得到的中東鐵路加以收回時，必自嚴加懲處，這是視作例外的。（請中國共產黨人注意，請中國所有國民注意。——編者）

民主政治是一個口號，而法西斯國家是魔干，等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後，與德國携手，是證明了德國固可以自由的侵略波蘭，而蘇俄的工作却是保持和平，其他國家與德國抗戰，不濟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近十年來做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徒，他必須相信此地所說的事實，並須在某一個時期竭力辯護，而在另一個時期，便須完全相反的说法。無論如何，這是外來的命令，叫他這樣做的。明顯的是真是假，都沒有關係的。把「黨線」預定了，而叫忠實的信徒這樣做，但是這是詐欺麼？不，誠實是中產階級的道德，但是這樣的改變，會使個人或羣衆感到痛苦麼？不，黨是高於人或痛苦之上的。譬如說，現在西線上曾經放出許爲豬欄到敵方的防禦內，來尋出是否埋有地雷，假定有地雷的話，這羣豬欄都被炸死了，這種方法共產黨已經用於美國的黑人，照一九三〇年

列寧的理論——理論與理論家都是空虛的字眼——殖民地 and 少數民族爲帝國主義者的特色，所以帝國主義國家是應當打倒的，黑人就是美國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這樣黑人應當被煽動着，來做國內的革命工作，但是這時候，假定成熟了，或許百萬黑人的大暴動就這樣的開始了。近年來的政治歷史，再沒有像共產黨和黑人勾當的慘酷的了。

最適當的例子，就是德蘇簽訂協定。幾天以後，共產黨機關的狀況，這種狀況是人格的最低墮落。每天必有新的解釋，每個新解釋，又與上一日的解釋相反着的，每一種解釋，都是把蘇俄官方新聞社的官報爲根據，然以前所說的，却絕不至於提及。這樣叫作真實的信念人們，不必神經過敏來拒絕，與這派人或運動互相往來，不論他們的經濟信念是怎樣，這樣歐美大多數人士爲了這些緣故，把共產黨拒絕了。

現在不但被拒絕了，簡直是喪失了它的政治地位。假定它繼續保持着這種地位，有些人主張保持現狀的，還可以把它來利用爲工具，因爲共產黨的商標，實爲很好的政治手腕，這樣許多人或政治運動，雖然和共產黨沒有關係，或不表同情，但是却會被沾污的。很好的例子，就是一新分配一制度，關於一新分配一制度的美點或缺點，我們姑不必論，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的吶喊，是會被反對者用作方法的一種，使之中途停頓的，共產黨被當作現代制度以對派的工具，我們不難想到大多數人們不選擇了。共產黨把它的地位，預先空虛了，而史太林却把它完全出空了。由蘇訂德蘇協會以後，共產黨是被逐出了，現在政治地位有自由了。我們現在能够怎樣來組織經濟方案，來保證人們得到生活，而它的標準，就是按照人們的生產能力的。我們能够把這個問題討論它的適宜性，我們能够在現下生存着的經濟組織裏來覓取對策，將來或許能够把現有的經濟組織，因爲有變更的必要時，而加以調整，或許根本從本上這些組織有變更的必要，但是至少我們能够把它們穩渡過去。

全部機構和分利制，及私有財產，或許有廢止的必要，而把國家或生產家的社會管理來代替它，究竟應當怎樣，我們可以把理智來討論。

又假定社會管理，是必要的話，那末政治學說和人類本能，並不是沒有辦法。就社會組織的當中來產生一個國家，有權力來實施經濟方案，而並沒有一黨獨裁，和全憑客觀信念的專制政體的缺陷。即使集體論者的經濟制度下，我們用不着灰色口號來互相交通。總之我們對於經濟問題，我們恢復我們的理智了。相信改造社會的人們，拒絕精神病療養院去，改良他們實施社會改造的方法，他們的力，和權能我們是可以駕御了。

一九三九年中，我們不能安閒的過去，但是國際共產黨是自殺了。它的離開，比它的生存好得多，因爲它離開了，世界得着利益。

（自哈普雜誌 *Har pois magazine*）



世界各國積極採辦制俄

遠東和平解決的途徑

T. A. Brisson

著者是美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對於遠東問題，尤負盛名。本文開端，即指出美國遠東政策的矛盾性，因為美國一方面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但同時又把軍用品大量輸日，但是美國爲什麼如此呢？著者未曾說明，而中國人也常常懷疑着，所以我們有代爲解答的必要。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任何人在法律範圍之內，都可從事各種活動，政府須一體保護，所以美國的宗教家，在中國造教堂。辦學校，慈惠醫院，商人在華營業，美國政府都加以保護，同時美國的軍火商把軍用品賣給日本，礦場把石油銅鐵賣給日本。美國政府也不能制止，因此美國一面對日抗議，說是日本侵害它在華的權益，但同時又把軍火供給日本，增加日本侵略的力量，其理由在此。誠然，美國一般的人民，亦教家慈善家，以及對華有關的商人，都主張美國政府禁止對日施行制裁，然而這種力量是萬萬敵不過美國的軍火商和礦場主人的，所以美國的輿論儘管高喊維護九國公約，實際上是毫無切實辦法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已近十年，中國望美制日行動的實現，不啻日夜祈禱，然而見於事實，只不過一個不承認滿洲國的原由，但貿易上是照常往來，現在來一個廢止商約，但是一切照舊。照美國這樣行動遲緩及辦法的不切實，恐怕再等幾十年也難有希望。可是美國確有對日制裁可能的，不過必須等到日本沒有錢去購買或是日本向他處另想辦法時，才會實現，然而對日何害，對我何益呢？追根結底說起來，中日兩個黃種人互相廝打，與白種人何關，落得兩面做生意然後再作道理，本支中所認爲理想的遠東和平解決的途徑，就是等中日疲敝之後，仍就聽美國吩咐而已。我們希望中日兩國的人民，都應有澈底的覺悟。

編者

兩年以來，觀察家已經指出美國的遠東政策，與本矛盾。表面上，美國非常反對日本在中國的武力行爲。所提出的各次抗議，在國際法上均是攻擊不破的，無須特別申述九國公約，來指責日本破壞門戶開放原則及侵害中國領土和行政主權的完整。但是事實上美國源源的大量的供給日本軍用材料，它的抵抗力量就減低了許多。

自然可說，這和首鼠兩端的政策是最可取的法子，與日本軍用貿易既可得利益，中國亦不會反對。因爲中國當局常常希望，美國人士既然非常同情中國，終將對於中國有有效的幫助之日。事實上尚有些研

究遠東政策的人們願意將這種政策合理的推進。爲什麼不放棄門戶開放及中國元整的老觀念呢？豈不是美國可以使它的遠東政策的問題，極端的簡單化，而且可以不顧中心的爭點，乘與日本在一種新的基礎上樹立一種關係。

無疑的這是很完善的理想的見地，這將等於使美國放棄它東方的政治勢力，如此或將減少戰爭的機會，但唯一困難就是，在實際的人生中，特別是廿世紀在遠東已有的實際關係中，它就毫無關係了。美國向來絕不願意把遠東霸權讓於日本，並且今日亦沒有預備這樣退讓的表示。

關於此點的理由很顯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而未開發的區域之一，這種區域所餘不多了，在這種困難時代中對於資本國家經濟的將來至關重要，也就是天然的競爭之處，競爭絕不會隨便撤退的。

設若美國放棄門戶開放的原則，在中國的美國商業與投資自可，後受日本的限制。如果在滿洲的經驗為標準，美國的商店將來恐怕得從中國全部撤退。換言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假使日本才能辦理。美國資本為發展中國的投資，也要如此辦法。不過就美國在中國的全體貿易而論，有關係的事實不是以往商業及投資的統計，而是自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美國貿易在中國所保持的領導地位。在日本監視下，中國前途的發展，美國與分，必居於次等地位，比較其商業及投資獨立時，必得不償失，這是特別可信及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下的中國將來發展起來，多半要變成日本經濟上的一個原料附屬物，徵兆已是如此了。

此外尚有幾個結果，不是純粹限於經濟的，亦將隨之而來。如果美國屈服，跳出遠東外，不算一個政治國家的話。包括在美國教會事業中的教育慈善及醫藥等事，在中國也要被清理——除非願意擔任宣傳日本文化的使命。而且說不定，美國這種默允的幫忙，或竟能使日本摧毀中國的軍事抵抗而致統制中國。美國放棄了遠東，在中國的戰事或許無限期延長，也是可有的結果。又難提議，美國如欲矯正這不良情勢，就應迫中國接受投降日本的和平條件，但是，如美國與日本新的妥協從經濟方面發生成就，這種結局亦有能。

此種的批評，如要演進到具體方面，就可引起美國考慮放棄在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之結果。沒有人希望美國幫助中國維護安全，出於純粹利己主義。雖然從歷史上看，這兩種政策早已互相憑藉。如完全使中國傾覆，美國對中國數十年的善意，就毀於一旦，中國人民可立即拋棄美國若干年的友誼；反而言之，對於中國命運有直接關係的大多數美國人士，亦要忿怒。所以美國遠東政策歷史上的主義，倘經提議改變，這種得失可在損益對照表上估計一下。

去年十一月份亞細亞雜誌載有葛雷斯瓦德教授(Professor Griswold)

許多如下的提議，對於解決如前複雜的遠東問題頗有見地。(英文譯文見新世紀第二卷第一期)新日美商約必須締結，條約上使日本得到的經濟機會越多，一體事件越行順利。日本有限度的移民，要根本訂入，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所載有關太平洋各領島不侵犯及不築砲台之協訂，也是要有。

美。在這種時機，給這種性質的讓步於日本，不能說不能得一時安舒，但是最後，要試探日本對於中國問題預備如何讓步。葛雷斯瓦德教授的意思，顯然是預備美國與日本立即訂定商約，但不附任何條件涉及中國，恐怕這就有問題了。在他的這種意思之內有三個說明或暗示的重要前提，茲列於後：

(一)中日戰爭不加時限，或者說在中國戰事任其延長「甚或中國與日本可進入一個現代百年戰爭中第二個二十五年」。

(二)美國自為之，不將其本身牽涉在中國領土及行政主權完整的問題以內，但這種意思不能明白規定出來，只可包含在條文以內。

(三)在這個時機美國無須涉及日本「東亞新秩序」問題。無論美國承認日本的「新秩序」或將來日本拋棄「新秩序」，都似乎不到討論的時候。

這些前提很重要，對於這些前提的批評也就重要了。就全體而論，很明白的是，在美日新商約之內，特別不考慮到中國。依據這種基礎訂定新商約，可絕對合法的準許以軍用材料售給日本。或有甚於此者。一九四十年一月二十六日現在商約滿期，美國可隨便下令禁止與日本通商。現在就訂新約，條件不涉及日本對中國的政策，能使日本尊重美國在華權利武器，就自行失掉了。

按葛雷斯瓦德教授的普通假說，新商約可訂，一方面遠東戰爭又可延長。誠然有一點可說的，是這種新約或者竟能在這個時機有一種氣壓力使中日想到休戰。但是這種可能性就像證明「烏托邦」一樣的立即消失。況且「休戰」這個名詞幾乎等於讓日本繼續佔據它的武力所佔的中國區域，然而此處要點顯然不願意利用商約，作一種武器來迫停止中

日戰爭。日美如此解決，不願在中國戰爭的延長，請問連帶發生的結果如何？

第三種前提，最重要的一條，因為關係中日兩國間最重大的爭點。日本的「新秩序」就是表示一種程序，根據政治上既征服中國，而達到管理中國經濟資源獨佔的目的。這一點就與美國關於門戶開放及中國領土行政主權完整的觀念正面衝突。但是在新商約談判之中，如不能談到日本「新秩序」，美國的地位很顯然是破產。況且葛雷斯瓦德教授還明白的指出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來，是新約包括的範圍，不僅是限於日本本部，且及於亞洲大陸上日本管轄的一切區域，就是日本在它管轄下的一切區域，得整理幣制或收關稅。這就是極端的承認，「新秩序」。還有一個要旨——為談判商約而起——要規定明瞭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等於關島(Guam) 薩姆亞羣島(Samoa) 波多利(Puerto Rico) 以及其他美國領地。那簡直是認為日本用武力新從中國劫取來的區域，是日本的領地了。

此類意見的最後結果就能完全明白了。結果是整個放棄了美國在遠東歷史上的目的，尤其是在中國的目的地。遠東霸權讓給日本算完。

雖然，已經說過，這和見地僅能算為美國提出來的一種理論上的行為，但是適用於實際人生的可能性，總之在廿世紀中是很少。今日——不管中立案之修正，或者因為修訂中立案發生的方針——美國是牽涉在歐洲(芬蘭)，在拉丁美洲(巴拿馬會議) 在亞洲(美大使格魯演講) 以內。現在是一切時代之最難看見美國在遠東施行徹底撤退計畫的時期。現在實際的要點，不是美國在遠東究竟要採取何種絕對政策，這是敢保證的，而其真正的問題是美國初步要取何種途徑。

葛雷斯瓦德教授會經很切實的指出來，日本極力並且繼續的尊重美國市場之獨立，因日美商約行將滿期，又恐禁止通商，致其經濟武器愈形銳利。況且美國現並未加入任何戰事，決意處理一件事務是自由的。太平洋美國艦隊是外交壓力一個有力的後盾。日本軍事地位在亞洲大陸上又日漸低落，因為最近數月內，在長沙及在外蒙古前線均遭過着重大

的挫折。如果日軍軍紀大壞的報告屬實，日軍的地位殊為可慮。

自從反共協定破裂，歐戰發生，遠東大國家的關係，時在變化之中。現時美國外交政策要取的途徑是令人推測不定的一件事。從一隅來看，格魯大使在東京的演講，解說的簡單明瞭。美國無効的抗議時期行將終了。美國國務院決意制止侵犯在華美國權利，並且要求有勁的恢復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東京方面若不欣然的承認及接受這些應辦的事項，美國預備禁止再賣美國軍事材料給日本。

因為遠東情形極端複雜，如認為這種簡單假說就是適當的表現美國政府，很容易走入迷途。有很大證明，可說此種方針將難以適合於英法聯合之需要與希望。日本侵略中國如果失敗，日本就要暫時失勢，不算一個東亞的大強國了。英國權威方面看重日本在亞洲是蘇俄的勁敵。從實際的觀察來說，或者英國想深取將來成立一個遠東慕尼黑會議的政策。如此，或許先與日本有一個妥協的接洽，承認日本在中國至少所得的一部分。總之，西方國家以結合反蘇時，將利用日本為它們在遠東的槍頭。

這樣的一個英國的政策，能希望影響美國對於現時遠東糾紛的態度，到何種程度呢？此處所說的這種計畫得不到美國切實的合作，難以希望辦通，是很明顯的。英法採取一種獨立政策應付這樣大的一個問題，不得美國同意，它們在歐亞兩洲的地位是有損無益的。另一方面看，美國修正中立案後，在歐洲已經是站在英法方面了，而最近美國的外交活動，像是逐漸趨向於反蘇。或者這種合作也能勢所必然的，轉移到遠東外交舞台上來。

在這種發展的途中至少有三大障礙。與日本的交涉，是這種發展的基礎，或者說能削弱美國遠東政策一貫的目的地。成立一種妥協，多少能恢復些中國門戶開放的樣子，同時還要保持日本的勢力及聲望不受損害，至少也是一個難題。倘如特別是西方各強國願意對日本退讓，並且承認華北及內蒙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或者也許能辦到。但是第二個難題就來了。即日本及蘇俄勢力的消長。因在中國的戰事，日本的力量已經是

減削了，並且大減了它對俄的武力。關東軍近來外蒙之敗蹟，就是明證。日本再與蘇俄發生戰爭，開始需要大量經濟幫助，最後需要海軍直接幫助，這幾乎是一定的。美國在備這種幫忙麼？否則，這件事結果大概凶多吉少。第三個難題是，要知道中國不能再當遠東舞台上的走狗，隨便拉在這邊或拉在那邊。中國除他經濟方面的不振外，已經變強了，它的武力是很值得估計的，並且對於「類」的妥協要說話的。所說的這「類」情形之下，中國或者當了犧牲者的角色，如果西方的民主國家確是不願它。如此它只有一條路子好走，就是絕對更要蘇俄供給軍用材料及軍事幫助，以便抵抗日本的侵略，中蘇關係於是結合愈甚，甚或進入一種公認的軍事聯盟的階段。這種結局，不是西方各國看見很舒服的。

它們尚有其他方法，與我們已考慮者不同。西方各國要保持它們在中國的地位，要幫助重慶方面，至少與蘇俄所助者相等。因為它們在中國的勢力就是遠東局勢的樑木。同時還要停止售給日本材料。這樣的一個政策才能解除蘇俄對於西方民主國家與日本可能結合的疑慮。或可希望減少推動蘇俄方面與日本妥協的壓力。凡是有關遠東問題顯然激動蘇俄當局及西方各民主國當局間的相互疑懼，或者從此可以驅除。

如果到此地步，對美國亦好。日本無論加入那一方面，恐怕都能引歐戰擴大到遠東來，有全世界毀滅之危，美國也逃不出去。日本中立下去，就是免除這。結局的唯一有效方法。但是還需要更積極的步驟。現時日本地位衰落，在可能範圍內，現在中日戰爭須要徹底解決。大國家都仍然注重歐戰方面，特別是美國及蘇俄，其實這兩個國家的勢力就足以解決遠東問題。

其基礎是將來必須有一個完全獨立的中國，及重新履行門戶開放政策。這比恢復以前狀態還加需要。預想，不僅日本要從所佔據的各區域內將軍隊撤退，及廢棄「東亞秩序」。即西方各國也要從北平天津上海撤退它們的駐軍，從中國內部及中國領海撤回它們的軍艦。還要放棄了它們在中國的政治法權。此外，它們還須與日本訂新條約，特別為美國，如要得到它遠東目的基礎，須有相當重要的讓讓，以便使日本的

經濟需要適當的滿意。這樣極端重要的事情辦的愈有效果，新的妥協之有力而持久，將來愈覺得可靠。

一個新商約對於日本貨物稅率寬大外，還須加以充分的經濟幫助之規定，以便使日本解決整頓戰時的工業生產後出口的困難問題。美國亦要給中國同等的經濟幫助，好使中國適用於戰後的建設工作，恢復戰時的損害。又應當對於中日商約交涉，供獻善意的斡旋，使日本在最惠條件下銷售貨物給它的天然市場之一的中國。交易的結果可使日本獲得中國的原料。美國又須取消排外案，使中日兩國得有有限度的移民。這些辦法可以造成一種環境使太平洋海軍限制及島嶼不設砲台的問題能再度召集開會協商。

這樣解決的價值很高，要求美國所幫助者也很多。遠東能再得新的安定，任何可能得到穩定及和平的其他方法，如不像上面所講的這樣面面俱到，大概終要失敗。遠東國家間的戰爭，犧牲將無限鉅大，而其結局亦將與此處所說者大不相同。(完)

譯自亞細亞雜誌Asia



史

料

列寧外交秘史

第五章 僵局

(續)

— W. Wheeler-Bennett
朱 深 譯

(三)
一月十八號的晚上，當托洛斯基的火車，正向着東北的彼得格勒疾馳時，蘇聯的首都裏，發生了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議有重大影響的一件事實。國民大會解散了。

自從三月革命以來，當共產黨人和臨時政府處於敵對地位的時候，他們曾經聯合了社會黨與中產階級的黨派，用延不召集國民大會的理由，攻擊爾服甫親王，後來又用下來攻擊克倫斯基。列寧立刻看出了一種國民民主集會的大眾力量，並且作為一種戰略上運用它。國民大會在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裏，是沒有什麼地位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祇承認無產階級的獨裁。可是列寧對於他所利用的武器，是從來沒什麼不安的。在共產黨人眼裏，國民大會不啻是用來鞭撻臨時政府的一條鞭子，同時他們力說由蘇聯掌握政權，是保險召開大會的「好保險」。

他們的獨裁制度一旦建立以後，共產黨對國民大會的態度，便急遽的改變了。這一件事變成了，左派，右派，中立派的衆矢之的。他們全希望羣起，顛覆蘇維埃獨裁制度。關於國民大會應否舉行選舉的問題，在共產黨內意見亦很不一致，比較極端的一派，主張將整個的擱起，將國民大會視同一種具文。史韋特洛人和旁的幾位，則以為共產黨本身的力量還太軟弱，不能漠視民衆對國民大會的要求，如果將國民大會延宕下去的話，蘇維埃的力量，——整個的俄國還是愚昧無知的，——將會越發軟弱下來。

當時列寧到底作何想法，那就不得而知，因為他並沒留下他個人意見的記載，可以稽考的，祇是他的兩個大徒弟的意見衝突的證據。依照托洛斯基的意見，他是贊成延宕選舉，將選舉年齡減低至十八歲，藉此增加選舉員數，和列一張新的選舉人名表，裏邊包括工農與智識份子的。

他還贊成將俄國憲政民主黨員與科泥羅夫的擁護者，一併褫奪其公民權。列寧對反對延宕的史惠特洛夫說：「如果這時候依照了舊的選舉人表冊舉行選舉，結果定是右派的社會民主黨，憲政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獲得勝利。在另一方面，史太林則說列寧是贊成召開國民大會，藉此可以使無產階級，在另一方面，可以證明共產黨的合作正當，這樣可以使無產階級，更加容易教導落伍的羣衆，為什麼這樣的議會應該使其破裂，」在小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的棺材上，再敲下一枚釘子。無論如何，不列寧個人的意見贊成與否，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召集選舉，同時也不管結果怎樣，決心不使大權旁落。

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二日，和十一月九日的選舉結果報告，表示共產黨雖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幾個別的城市，獲得了過半的票數，在七月選舉區中的五十四區，他們祇從三千六百二十五萬票數中間，獲得了九百萬票，而社會革命黨則獲得了將近一千一百萬的絕對大多數。人民委員會採取了決斷而又迅速的處置。他們立即逮捕了全數的「全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將他在斯摩尼拘禁了兩日，另派了烏列斯基作選舉委員，並且給他一項新的訓令，就是必須有四百代表出席，國民

大會方能開得成功。

共產黨就是利用了這種阻礙方法，使國民大會一直無法舉行——雖則在十二月十一日，曾經有過一次召開會議的流產的嘗試，——直得他們將毀壞大會計劃完成。俄羅斯各地的共產黨代表，由於列寧的主張與史惠特洛夫的指導，集中到彼得格勒來，他們全被分派在不同的工廠，工場和軍隊團體中間去。他們在那兒組織黨「細胞」，造成一種有利於共產黨的空氣，將工人組織起來反對民主政治的理論。

右派的社會革命黨，也在增強他們的地位。他們出版了一種痛斥共產黨的報紙，他們希望能夠導致到前時的兩師團上等軍隊，他們努力武裝工人，甚至想利用重進軍事大學進修的籍口，將前線的軍隊召回來。他們還想出了一個誘捕全體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計劃，並牽連到一個暗殺列寧的陰謀，弗里茨·柏拉登便是在這次手上受傷的。

到了一九一八年正月的第三個星期，法定代表員數已經滿額，齊集在彼得格勒，而共產黨的一切佈置也就就緒了。無論如何，彼得格勒的陰謀與反陰謀的空氣，已經緊張到再遲延下去，便會引起一個過早的爆發，所以定於正月十八日實行召集代表開會。不過人民委員會也同時明白宣稱，除非這次大會承認蘇維埃政權，批准蘇維埃二次大會的綱領，和贊成這團體所採取的社會主義化的步驟，否則立時解散國民大會。

當出席國民大會的代表，齊集在托立德德皇宮（Tauride）時，他們看到一切的通路，都有里窩尼亞的來福槍兵，和赤衛軍嚴密的守衛着。沒有出入證的，統不許進去。狄彭科，人民委員裏的軍政部長，謹慎而又慎密的佈置着，屋頂上架着機關鎗，又從威堡（Viborg）和赫星法斯（Helsingors）抽調了兩千海軍，增強防衛的實力。這種種預防，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擁護大會與反對大會的示威遊行，塞滿了各條街道，結果引起了劇烈的巷戰，大國的代理公使，和日本大使，那時本都要依時趕去美國大使館出席會議，（協約國使節團的領袖，已經在那兒開會了。）也因此而受到了阻遲。在他們進行討論的時候，（結果是在協約國的外交家，一致同意不參加國民大會的開幕典禮）槍聲與衝突的

聲音，不斷的傳到耳朶裏來

會議本定在正午舉行，可是俄國人是永不違守時間的，所以直延至下午四時才開。對於可能的結果，許多人不斷的加以推測。誰都預料共產黨會取什麼激烈手段，所以許多跑來出席的，隨身帶了蠟燭和夾肉麵包來，預備作受包圍的時候的用途。「民主政治便是用蠟燭和夾肉麵包全武裝了，進來和獨裁制度戰鬥的」，托洛斯基藐視的說。

第一個衝突在一開頭便發生了。右派的社會革命黨，因為屬於多數派，所以推舉在場的最老的會員，他們自己黨員裏的一個，舍基·柏特洛維支·薛甫梭夫，（Serge Petrovich Shevtsov）作爲臨時主席，可是他剛提了搖，史惠特洛夫，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佔據了主席的座位，在右派與中立派的「你這個兇手，滾開去洗乾淨你那雙血腥氣的手罷」的怒喊聲中，向大會宣讀人民委員會關於它的責任，行動與條件的宣言，大會祇有依據上述的原則，方纔容許存在。

在會場秩序紊亂得非尋常的情形下，共產黨員力竭聲嘶的唱着「國際歌」的時候，一面推舉着大會主席。右派的社會革命黨推舉維克多柴諾夫，以前克倫斯基的農業部長；共產黨推舉了一個他們自己的黨員，左派的社會革命黨，則推舉瑪利亞·斯璧列·諾伐，（Maria Spiridonova）她爲了暗殺坦波夫（Tambov）總督流放西伯利亞十五年，現在沒有滿期便釋放了回來。選舉的結果，大多數都推舉柴諾夫，一個場鼻子上戴着眼鏡，簡直沒有鬍鬚，和額骨突出得很利害的男子，（托洛斯基會將他描寫得栩栩欲活，雖則或許不是過真的；「多言的，情感的，軟弱的，賣弄風情的，挺顯著的，是令人作嘔的」）作了大會主席。

柴諾夫在他的開會辭裏，便攻擊共產黨沒有兌現在外交與內政上的諾言，並對民主憲政政府，予以很深的期望。接着布哈林代表共產黨說話，然後是塔索退立代表社會民主黨說話，他否認人民委員會有權可以要求大會，追認他們的行動，作爲維持大會生命的交換條件，他建議採用一種社會民主的綱領，國民大會就依此法定的綱領，暫時算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

塔索退立以後，接着又是幾個反共發言人起來發表意見，他們的演辭，不時被樓座裏的叫喊聲間斷與掩蓋，樓座裏全坐滿了陸軍、海軍與工人，（他們是經過赤衛軍 令的特許而跑進來的，）他們佔領了樓座，用笑謔怪叫來打攪對方。這種會場上極端混亂的 形，頓使人憶起巴黎革命時一次更下賤的會議。

尖銳的衝突，發生在表決當天的議程的時候。——那時已是一月十九日早上一句鐘模樣。右派的社會革命黨希望討論他們的和平計畫與土地改革方案，共產黨則要求先討論他們的「勞動與開拓人民的權利宣言」。表決的結果是二百三十七對一百三十六票，右派的社會革命黨獲得了勝利。那時候，會場上毫無秩序可言，看來打架是逼近的了，共產黨的代表退下會場，一個鐘點左右以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代表，也退了出去。

列寧離開托立德皇宮，便回到斯摩尼女學校來。這兒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連在開着會議。在這兒他得到了共產黨退出大會的消息，於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刻議決將大會解散，那張佈告就在列寧自己的手裏，他在那兒很快的寫就的。那是一張簡潔而又斷然語氣的公文：

「這個依照了十一月革命以前的名冊，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的是妥協者與憲政民主黨執政時的舊時制度。它對蘇維埃一連採取一種公開攻擊的態度，要求推翻蘇維埃，和這樣竭力援助開拓者，阻止他們將土地與工廠轉讓給勞動者，所以事實上分明白，這種國民大會，祇能援助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份子，來粉碎蘇維埃的權力。爲了上述的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因此佈告將國民大會解散。」

列寧自己將這佈告帶到托立德皇宮去。他將一份書面命令交給了警衛隊的官員，「此次國民大會元畢後即予解散；」同時他又在口頭上吩咐，「注意，從明天起，不論是誰，都不准跑進皇宮去。」

那時是上午四句鐘。警衛的官員與海軍都疲倦得行什八似的，可是代表們並沒有減少興趣的樣子。他現在可不可以閉會，警衛的官員問列寧。列寧自己沒有直接給予命令，祇是鼓勵的朝他微笑了笑，愉快的

向這個官員道了晚安，便回到斯摩尼去了。

在會議場裏，空氣是莊嚴而又熱烈的。共產黨的代表離場以後，大會在發狂一般的喝采聲中，通過了右派社會革命黨所擬定的土地法。當議案三讀通過以後，警衛的官員跑到會議場來，走到主席身邊，老朋友似的拍拍柴諾夫的肩頭，向柴諾夫解釋，他現在執行人民委員會的任務，因爲警衛的兵士已守備得疲憊不堪，要求代表們回去。

「國民大會的出席代表全十分疲倦了，」柴諾夫回答，「不過他們不能妨礙俄國所等待的法律。」於是他們將警備官置之不睬，開始迅速的宣讀和平宣言，要求協約國闡明「使一切交戰國家能够接受的平等的和平的確實條件，」就像是從克倫斯基時代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旁的事實一般。

這個警衛官員，最後忍耐不下去了，他命令軍隊將燈火息滅。在逐漸暗下去的時候，秩序亂起來了，在樓座上的歡呼與怪叫聲中，可以聽到柴諾夫的憂鬱聲音宣佈，「現在宣佈俄國是一個聯邦民主國。」

（四）

托洛斯基就在發生這許多重要事件的早上到達彼得格勒，照他說，就是在那個時候，列寧的意見還是以爲最好沒有召開國民大會。「我們沒有將這個會議硬宕下去，在我們方面 實在是冒了一個大危險——那是十分不聰明的辦法。」他說：「不爲到了後來，最好還是這樣發生了。由蘇維埃政權來解散國民大會，是用革命獨裁制度的名義，對正式民主政治的整個與公開的清算。這將是一個好的教訓。」

在一種革命的意義上說，那或許是正確的，不過在事實上，對國民大會清算，不論在國內與國外，使蘇維埃的地位，都蒙受了嚴重的損害。中歐同盟國以 常常怕國民大會，會變成俄國內愛國團體恢復力量的場所，結果蘇聯政府會被迫和 妥協與聯合起來。甚至有人相信，這種聯合的結果，或許會造成繼續戰爭的嘗試。可是現在國民大會的解散，使德國人士深信，俄國預備用任何代價從事結束戰爭。還有，共產黨人的壓迫國民大會，也等於是放棄了前時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所

利用的道德立場。這兒證明了費弗曼所攻擊的每一個理由，全是最低不過的。他們再也不能責罵德國人，在佔據區域內，拒絕容納自由意志的表示了。

同樣的，在協約國的國慶日，也引起了一種全面的反感，如英國的勞工黨，甚至在近今正月十五日，宣佈為英國人民的目的，「和蘇俄人民的目的相同。」那許多還沒曉得蘇俄殘忍手段的人們，本來希望這個國民大會，能夠產生一個俄國、革命黨派的滿意的混合體，現在全給這個罪惡昭彰的獨裁制度的行為心寒了。趕快將他們對俄國革命的意見予以修正。列寧和托洛斯基全是德國收買的人，和蘇俄政府和德國參謀部是「合夥」組織的傳說，重新流行起來。由托洛斯基與費弗曼在伯萊斯特的交談看來，這種傳說不無幽默性。就是在德國，在大眾社會黨裏流行着固執的謠言，說俄國共產黨已被德政府收買，而在和議席上發生的一切，祇是增加了預定節目，排演的一齣。稽而已，愛德華·本斯泰因，(Eduard Bernstein) 德國國會的下院議員，正月十四日在高爾基主編的 *Novaya Zhizn* 上寫，在德國的軍界裏，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議的成功，公開的承認那事實，就是對一切應該予以「沖貼」的，都已經「沖貼過了」。本斯泰因斷言，列寧與托洛斯基本人的忠實是不容置疑的，不過許多人相信，列寧在回到俄國去的時候，拿了德國的金錢，所以他們已經「變成了這次疏忽舉動的奴隸了」。

托洛斯基在二月二十日抵達伯萊斯特，重新參加同盟會議的時候，他掛念的，便是最後而且永遠的，鎖壓住這個問題。他堅信不論付出如何重大的代價，在簽署和約以前，應將蘇維埃俄國與帝國的德意志中間存在的根之仇恨，向歐洲的資產階級顯示某種顯明的證據。從這種信仰裏，產生了托洛斯基自己所定名的一小學教師示威運動的胚胎，它的公式便是「我們停止戰爭，可是我們不簽訂和約。」關於德國是否能夠派遣軍隊 擊俄國一節，必須試驗一下。如果他們不派遣軍隊，這便是說獲得了一種在遠大成果的確實勝利；如果他們派遣軍隊，便可以依仗鋒利話來，作為宣傳攻擊的資料。

這念頭在毛洛斯基的心上已經盤轉了多時。他先和加門納夫商量，然後再和旁的同僚商量；所有的人彷彿都同情他的計劃。最後他寫信給列寧：

發拉第藏·伊列支 我不能簽署他們的和約。他們已和波蘭、立陶宛、庫爾蘭與旁的偽政府，簽訂了關於，地割讓，軍事與海關的條約。關於「民，自決」這一點，依照德方的解釋，這許多地方已經是獨立的國家，因為是獨立的國家，她們已經與德國和奧匈，締結了和約，與其他協定。我們不能簽署他們的和約。我的計劃是這樣：

我們「佈戰」的終結與復員，而不簽署任何的和約。我們可以宣佈我們不能參加中歐同盟國的盜匪和平，所以我們也不能簽署一種盜匪的和約。我們將波蘭、立陶宛與庫爾蘭的命運，交由德國勞工階級負責去。我們在宣佈戰爭終了以後，德國是不會攻擊我們的。無論如何，德國因為國內情形的緣故，她是不容易攻擊我們的。那許多 *Scheidemansches* 如果德政府對俄國革命，提出侵略的要求，他們將採取一種正式的决定，和政府决裂。

Berliner Tageblatt 和 *Vossische Zeitung*，要求不顧一切與蘇俄成諒解。中立派也贊成訂立一種協定。內在的鬥爭正在破壞德政府的風紀。報紙上對於西線的戰鬥，也是展開了尖銳的矛盾意見。

我們宣佈終結戰爭，可是並不簽署一份和約，他們不會向我們採取攻勢的。如果對方攻擊我們，我們的地位不見得比現在所處的更壞，那時他們便會乘此機會，在威爾遜總統的宣言以後，說我們是完美的經紀人，然後開始一種攻擊。

我們必須等待來決定。我們還可以將會議延宕三四天。再下去他們便會使其破裂了，除掉上述計畫以外，我想不到有旁的辦法了。我和你握手。

你的朋友托洛斯基

再寄一！請由無線電復示：「我贊成你的計劃」或「我不贊成」。不過列寧是不會那麼慌張得立刻給與一個魯莽的答覆的，托洛斯基

的新計劃，老實說他是極端疑感的，像他疑惑布哈林的主張——假革命十字軍的名義，重行對德戰爭——一樣。他的同僚們爲什麼這樣輕易相信呢？布哈林到底和將什一來一戰呢？爲什麼托洛斯基那麼確定德方不會繼續採取攻勢呢？中歐的革命到底有了什麼確切象徵呢？祇有列寧能够看得清楚，祇爲他能够完全洞到這險惡的局面，直探索到最深的底層，發現了自身的薄弱無力。他們不能再戰，他們必須議和，就是最吃虧的和平都行。

列寧率領的，正是一批難對付的隊伍，他還沒有達到將他的計劃可以同同僚公開的地步。而現在來一次破裂，或許會造成黨的聲名永遠狼藉，和俄國的共產革命的崩潰，他預備召集一個秘密會議，在這會議裏，托洛斯基，布哈林和他都可以明白表示他們的意見。他或許可以將自己的主張，來說服他們。

就爲了這個理由，他對托洛斯基的信，既沒有作肯定的答覆，也沒有作消極的答覆，他祇是打了極簡短的電報給他，「你到彼得格勒時，再詳談可也。」所以在一月十八日，當和德軍處於危急局面的時候，托洛斯基將實情報告了斯摩尼方面以後，他前後收到了兩個覆電：「史太林剛纔到，」列寧的第一封電報上說，「我們預備將這件事和他討論以後，再立刻給你一個聯合的答覆；」在一點鐘之內，第二個電報又來了，電報上用的是兩個人的署名，這封電報後來竟成了托洛斯基的致命打擊；「要求暫行休會，」由彼得格勒來：列寧，史太林。「托洛斯基便是根據了這封電訓，要求暫行休會的。現在他已回到了彼得格勒，於是爲革命生命的戰鬥便開始了。」

一月二十一日，托洛斯基向一羣黨的領袖人物，提出了他的理論見解，並且獲得了史太林，加門納夫，和其他幾個的擁護，布哈林則熱烈主張使和議即刻破裂。用「合戰爭」名義，從新對德作戰。亞力山·珂倫泰，伊拉·康，(Bela Kun) 波克，甫斯基，賴特，烏列斯大基和皮亞塔可夫 (Pyatakoff) 贊成後者的主張。

列寧靜聽着兩方面的意見。事情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托洛斯基複雜

的頭腦，想出了一個複雜的方案，而太過熱情的布哈林則主張事實上所辦不到的。

「很好，」他對托洛斯基說。如果我們能够確定，賀弗曼不會派遣軍隊來攻擊我們，那是最好也沒有的了。不過假定他能够，兵來攻擊又怎麼辦呢？你自己便告訴過我，俄國的戰壕全是空的。如果德國人重新攻擊又怎麼辦呢？」

「那時我們便得被逼簽訂和約，不過誰都會曉得，那是我們沒有其他選擇才這樣做的。祇有這樣我們才能粉碎『我們與霍亨索倫皇室秘密勾結』的流言。」托洛斯基說。

「不，這也太冒險了。在目前，我們的革命比其他一切更爲重要；不論我們犧牲什麼代價，我們必須認清這點。」

於是布哈林起來堅持他的主張。

「我的可憐的朋友，」列寧忿然的說：「到前線去走一趟，看我們能不能再戰罷。」

暴躁的斯捷克，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怒瞪着列寧，叫：「要是彼得格勒有五百個勇敢的人，我們要將你捉入牢獄去。」可是列寧却像鑽石一般的冷淡，不自覺的預言道：「真的，有人要被關進監牢去；不過如果你計算一下可能性時，你可以看到多半還是我將你送進去。」

然後他將現今有名的「二二」一篇論文，「他揮智竭慮，搜索枯腸得來的心血結晶，向他們宣讀，再說明他爲什麼要接受德國議和條件的理由，不過這必須在將和議儘量拖延以後，方可接收。」

「如果要使社會主義在俄國成功，必須有一段時間，至少是幾個月，社會主義政府可以自由行動，先將國內資產階級打倒，然後再築下擴充的與深固的組織的基礎。」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議，現今已充分指明，德國的戰爭派是佔了上風，並且給了我們怎樣數量的最後通牒。俄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面前，橫一個必須立刻解決的問題：那便是接受屈辱的和平呢，還是立刻發動一個革命的戰爭。事實上再也沒有旁的解決辦法。我們不能再延不決定；我們已經用盡了

一切可能與不可能的方法，將這和議拖延了下來。至於我們是否能夠立刻發動一個革命戰爭的問題，那必需完全按照實際情形與業已開始的社會革命的利益而定。如果我們將許多贊成立刻發動革命性戰的理由歸納起來，我們便可以看到他們所擁護的政策，祇能使那許多希冀浪漫與美麗的人士滿足，而他們是完全不顧客觀的階級勢力的相互關係，完全不將社會革命真正在開展的實情加以考慮的。不用說，現在（或許是以後的幾個星期，或許是以後的幾個月。）我們的軍隊不會阻止德國的攻勢。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將社會革命的命運，冒險的放在希冀某日德國或許會爆發革命那一點上，可說是一種極劣的政策。這樣的一種政策，實在是太冒險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株待這樣的機會。

「現在締結一種個別的和約，照現今的情勢看來，我們祇是掙脫了那兩個互相廝打的帝國主義的集團。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戰爭。這個戰爭，使我們不容易達到將歐洲犧牲的一致意見，而我們則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故手的擴展與加強社會革命。……現在要發動一種真正革命性的戰爭，那必須在一個社會民主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戰爭。……不過在現今，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這作為我們的目的。其實我們現在應該為，立陶宛和庫爾蘭的解放而戰爭，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當他遵奉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據時，他定會說社會主義的利益，是超過於各國民族自決的權利的。……以解放波蘭，立陶宛與庫爾蘭為條件的和平，在俄國的觀點看來，那是一種「愛國的」和平，而在侵略者與德國帝國主義者看來，亦復如此。」

有幾樣文件，更加簡短地說明了：列寧是一個革命的機會主義者的天才，否則便是他對政治手腕與實際政策的價值，有種透澈的認識。他以冷靜的觀察，預見到對德單獨媾和，可以用來作為拯救俄國革命之用。他同「明白」我們時代中的世界革命一之謎，遲早終有被破的一天。他像是一個良將一般，他早已對那無可避免的反動，一種或許會威脅到共產黨本身存在的反動，業已準備了對付辦法。他現在所說的東西，還

沒有到公開發表的時期，可是先使他的同僚們，能夠設法對付這終於沒法避免的，冷確而真確的事實。不用二十分鐘，他便將他的論文讀完了。不作什麼手勢，也沒什麼着重氣。他將他的論點，明白而又冷靜的敘述了——然後等待着。

可是黨內的領袖與兵士，大半都不能看出列寧見解的卓異地方來。這和共產黨一連散佈的口號與宣傳，恰巧相反。那是一種妥協態度，而列寧就一連都是反對妥協態度的啊！那等於是自認失敗，而列寧就一連都是反對妥協態度的啊！那等於自認失敗，而列寧便親自告訴他們，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祇要吹吹口笛便行了，西歐的無產階級會起來掃蕩它們的資本主義的政府的。他們這到現在，還是聽到這樣的論調。「國際革命勝利的時日，已經迫近了，真理報上便這樣寫：後來又說，「一種誠實和平的勝利已經來了。」現在一下子要教他們接受和信仰已久的，完全相反的東西，那實在是太難了。一切獨裁者都得遇到的主要難題，便是怎樣將革命成功以後的政策，符合他們革命以前的宣傳。

黨內派別的鬥爭，一天緊張過一天，一天尖銳過一天。照托洛斯基說，意見懸殊的不是他和列寧，而是列寧與布哈林。至於主要的爭點，就是俄國能不能發動一種革命的戰爭，和革命政權是否可以和帝國主義的政府簽訂協定兩個問題，列寧與托洛斯基中間，意見上並沒有多大差異。他們都認為第一個問題「不可能」，而第二個問題是「可能的」，不同的地方祇是接受中歐同盟國條件的時間與方法而已。

正月二十一日出席的六十三個黨員，曾作了一度非正式表決，贊成列寧政策的有十五個，贊成托洛斯基的十六個，贊成布哈林的則有三十二個。當時大家決定，從二百個地方蘇維埃，來測驗關於和戰的意見，結果是除掉兩處（彼得格勒和塞巴斯托波爾）後者是附帶了保留的（雅羅和斯平外！莫斯科，業卡忒堡，（Ekaterinburg）哈科夫，（Khar'kov）喀琅斯塔得（Kronstadt）和其他地方的蘇維埃代表，全是狂叫着戰爭。

在下一天，這個問題從秘密討論移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意見上的裂

痕已經變得那麼深闊，看黨的分裂是無法避免的了。於是列寧又給他的論文，作了一度熱烈的辯護，假使他們簽署。他叫托洛斯基的「本是一戰——也不是和平」的方案，是一種他們沒有力量辦到的「國際上政治的示威運動」。如果德國再是前進，無論怎樣，我們便得締結和約了，不過那時德方提出的條件，將比現在提出的更苛。德國一旦開始了一種新的攻勢，德國人對我們爲什麼還要從寬發落呢？他們爲什麼不向完全沒有抵抗的民族，堅持索取他們所希望的東西呢？俄國人還來得及簽訂和約嗎？當這隻野獸突然跳了起來。列寧說。他對這一切全看得十分明白。本週十一月革命日子的光榮，仍舊蒙住了旁人的眼睛。托洛斯基談起了業已迫近的中歐革命。我們不能信任德國的無產階級，列寧將心底裏的祕密說了出來。德國祇是有革命的醜態。剛受學不要誤會是快臨盆了。可是這兒在我們俄國，目前則擺了一個健康的強壯的孩子。如果我們發動一次戰爭，我們准會弄死他的。列寧又對布哈林及其擁護者說：「在波羅的海島嶼上德人所處的地位是這樣的，在二次攻勢裏，他們便可以空手將彼得格勒與果發爾（Gdansk）奪了下來。」

可是一切解說全屬徒勞，俄國正在一片革命戰爭的狂熱裏，以前吵着不論什麼代價必須獲得和平的人民，現在則又一樣熱心的吵着要發動一種神聖的戰爭了。不過軍隊並不在那兒；於是它便溶解掉了。

列寧沒有向這個完全瘋狂的政策投降，他寧願和托洛斯基妥協。他並不贊成托洛斯基的計劃，而且深信他們定遭失敗，結果是無可避免的接受了更加苛刻的條件。不過因爲缺少一個第二次的大政變，而黨的分裂或許使黨就此永遠斷送，所以他不能將自己的意見，堅要他的同僚接受。在一種更苛酷和平與一種「革命戰爭」的確實災難中間，列寧毫不躊躇的採了第一種。他答應讓托洛斯基試驗一下他的政策。

「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總不會去支持革命戰爭的口號的，是不是？」當他們訂好了合同時，列寧這樣的問他。

「無論如何不會的。」

「那末這次實驗或許可以不至於十分危險。我們爲了和托洛斯基簽

訂一份良好和約的緣故，我們祇失去愛沙尼亞與里窩尼亞便儘够了。」列寧再是意味深長的冷笑了笑說，「里窩尼亞與愛沙尼亞是值得失去的。」

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月十二日舉行表決。布哈林的革命戰爭的建議，以十一對票二（此外還有一張迴避票）而否決了，列寧的將和議再拖延下去的動議，則以十二票對一的多數通過了，托洛斯基的「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的公式，則在最後表決時，以九票對七的而被大會接受。不過對於接受德國條件的問題，依舊沒有作什麼決定。它祇是給托洛斯基放手去施展他的延宕戰略，然後在適當時候，（到底什麼時候才是適當時候，則由托洛斯基自己決定，）再實行他的「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的公式。它的決定則直接對人民革命委員會負責。

爲了將德國在伯萊斯特要求的暴行，通知中歐的勞工起見，一月二十三日舉行了兩次無線電廣播，說明和平的條件，不啻是一種可怕的侵略，「而和議的詳情，則因德奧匈不敢將她們的要求公開的緣故，所以勞工們還是茫無所知。」德奧匈的人民給她們自己的政府欺騙了。」

托洛斯基還沒有放棄那種希望，就是如果德國真的採取一種攻勢時，可以從協約國那兒獲得援助。他還在希冀德國國內會發生革命，那時便可以阻止德國進攻俄國。他全盤的政策，都是根據了即使和議破裂，德國也不會進兵的假設。不過要是他們真的進攻的話，他希望能夠從協約國援助的諾言，而得到保證。（再度的担保。）像往常一般，他先在彼得格勒的非正式代表中間活動。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兩天以後，他去請了沙杜爾來，拿出賀弗曼的地圖給他看，請他將這幅地圖帶去給他的大使與法國軍事代表團長官看看。

「我們不願簽訂和約，又怎麼辦呢？」沙杜爾對他說。「神聖的戰爭嗎？是的，我們可以担保，不過我們又會得到怎樣的一種結果呢？現在是協約國應該決心的時候了！」托洛斯基還請了魯濱斯來，問他美國對於承認問題，預備採取什麼態度。魯濱斯祇能告訴他大使並沒有收到

什麼訓令。魯濱斯和沙杜爾都沒有給托洛斯基什麼安慰。

不過托洛斯基並不失望。要是協約國不肯合作，那末等他來給他們受一下痛苦也好。無論如何不使德 前進。在二月二十六號晚上，在去伯塞斯以前，托洛斯基對第一屆蘇維埃大會，那是在國 人 一 解 後便刊着名其的、發表了說。那是一篇報告，同時也是一份 戰 告；那是人事件前夕的一篇戰鬥的演 說，可是對於情勢上許多個重要的因素，竟奇怪的就忽了過去。恰巧像協約國所相信的——至少是有許多 補 人物相信——列寧與托洛斯基是德 參 本部收買下來的人，同樣的列寧與托洛斯基堅信關於德蘇和議的事件，協約國和德國暗中定然有種 勾 結。這兩件事全是荒誕得可笑的；可是在那論議和的綜綱劇本上，却 也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德國提出的和平條件，協約國政府應該負責——托洛斯基指着掛 在那兒的賈非曼的地圖，一鼠向到會的代表報告，「倫敦方面完全默許 庫爾曼的條件；我要請 們特別注意這點。英國預備以俄國為犧牲而和 德國妥協。德國向我們提出的和議條件就是英美法想對我們提出的條 件； 們便是世界上帝國主義者對蘇俄革命所開的賬目。……」

同志們，我們今晚就要出發到伯塞斯特。里托夫斯克去。……我 們不說什麼勝利的誇口話。……不過我們願意和你們一起，為獲得一種 誠實與平等的和平而奮鬥。我們要反抗中歐國家，她們不能將進攻的恫 嚇而嚇退我們的。德國的士兵能否聽從他們，他們並沒有得到保證。我 們就要進行我們這散舊時軍隊的程序，軍行組織一支社會主義的赤衛軍 。如果德國的帝國主義者想將 們壓倒我們，……我們會對西方的弟 兄們說，「你們聽到嗎？」他們就會回答「我們聽到了。」

列寧坐在講壇上的主席團席上，就托洛斯基的後面，注視着這獅 子一般的且，富於肌肉的肩膀，和小得利害的手的隨時的姿勢，在他聽 來，這一切定是最無聊的談話，他完全聽得德國的革命還沒有成熟？李 普克尼希還因在牢獄裏面，羅薩·盧森堡也是如此；那兒什麼都希望不 到。

可是——可是——那彷彿是個盼望了那麼長久的革命奇蹟，快要 實現了。托洛斯基還沒有離開彼得格勒，罷工與暴動的洪流，便在德奧 蔓延了開。柏林與維也納都 了蘇維埃政府。漢堡、(Hamburg) 布魯門、(Bremen) 及比錫、(Leipzig) 厄森(Essen) 與慕尼黑接踵起來 。在大柏林的街上，可以聽到 將一切 權交給蘇維埃的呼聲，那 兒有五十萬左右的工人都停止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最主要的要求，便是 依照蘇俄人民委員會在伯塞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原則，根據民族自 決的大前提，迅速結沒有侵略土地與索取賠償的和議，再是各國推派 工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

可是使那許多在彼得格勒抱了無限希望，靜待中歐工潮發展的人士 ，大大地到失望的，德奧的罷工潮，祇是一個無效的努力，一個假的 曙光。雖則一部分是爲了革命的根本原因，可是主要是由於勞工階級的 神經的疲憊；雖則那指明獨立社會黨和斯巴達克斯黨員的勢力，已經在 德國發展到某種程度，可是那不能認爲是勞工階級對伯塞斯特·里托 夫斯克和 條件的一種合法抗議。那毋寧是智力上與體力上都已榨乾的 人民，向德國最高統帥部的一種抗議，因爲最高統帥部自從把捉住國內 的工業生命以後，便使他們負上逐漸增加的重負與困難。

罷工的工人，受到了最嚴厲和最殘酷的處分。在戰時罷工，是和最 利害的叛國罪同樣看待的，所以罷工者受到了嚴厲的處罰。各大城市都 宣佈了戒嚴，勞工的報紙禁止出版，一切罷工的集會，全被警察強迫解 散。在柏林，有一個領袖給逮捕了，受到在一個堡壘裏監禁五年的判 決。預備役裏的幾千工人都被召入伍，最後柏林有七所大的工廠，由軍 事當局保護與管理，工人們如不復工，便按照最嚴厲的戒嚴令處罰。

到了二月三日，整個的罷工運動瓦解了，可是它在國內留下的影響 ，却是十分嚴重的，這從魯登道夫在二月十八日，寫給軍政部長的一封信 裏，可以看出，他提議以後的勞工糾紛，必須用「寬大而不是使用武 力」的方式來解決。「無論如何，」他接着說「那是必須準備應付一切 萬一的事變，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已經允許了將所要求的隊伍，留駐

在國內的。」在事實上，他是那麼不安，他對每一支軍隊的率領長官，發出了一道秘密的訓令，吩咐他們留下兩個步兵大隊，專門對付國內的老百姓。

在彼得格勒和伯萊斯特。觀察者裏，輻輳樓幻景是消失了，德國革命是天折了，列寧的觀 沒有錯。誰都不應。將剛受孕的現象，便誤會是快臨盆了。

(五)

當托洛斯基在彼得格勒爲了他的原則奮鬥的時候，庫爾曼和賽寧也正在他，各自的首都裏，爲「主權與權力」而撲鬥着。赫耳特令利用庫爾曼留駐在柏林的 會，在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外交討論 會上，對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和平條件，作了一個公開的答覆。他表示「受「公開締結盟約」的公式，於是引證事實，指明伯萊斯特的和議是在整個公開的情形下進行的，而且德國預備完全接受將和議公開作爲一種普通的政治上的原則。

可是關於蘇聯的問題，這位皇室大臣是躲閃而又謹慎的。他認爲；協約國既然拒絕參加和議，她們便無權過問這業已變成蘇聯與中歐同盟國的事，就是德國堅決單獨媾和也好，因爲事實上勞合·喬治在正月五日，當他公開而又露骨的洗手不干俄國事的時候，實際上便是這樣承認了的。

「現在協約國已經拒絕參加……我必須拒絕承認以後任何的衝突。(赫耳特令說。)我們這兒是處理有關於蘇俄與中歐同盟國的問題。我堅信，承認帝俄西面邊界各民族的自決權，這許多民並定可建立良好的關係，也可以對其餘俄國部分發生同樣的關係。我們十分懇切的希望，這許多國家會從速恢復和平，和保證國家幸福的情形。」

這位帝皇大臣的演說，雖則大體上是極帶了適度的熱，對威爾遜和平條件的接受，可是在德議會與辯論的語氣，主要則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激辯，庫爾曼爲了伯萊斯特和議與他的整個外交行動，備受左右派兩方面的攻擊，許多左派的議員有信他是沒有誠意，專用權力的，而右派

則攻擊他缺乏執行執拗能力。有幾個議員坦白的擁護一種全盤侵略的政策，不單在東方，就是在西方亦是如此，而主張得最積極的，便是國家自由黨的領袖，斯特萊則曼(Sir Semann)和字爾曼(Fuhrmann)那個在戰場上出來的政治家，手裏竟沒有帶了龍威·布里斯(Longwy-Brey)，與比利時回來，沒有將英國勢力下的法蘭德斯(Flanders)加以解放，沒有將摩司(Meuse)線放入我們的掌握，他就像掘墓者一樣，將德國歷史上的威靈，也墜落了下去。」字爾曼對好了庫爾曼坐着的大臣席嘆着。

不過字爾曼先生和他極端愛國主義者氣徒的意見，那時候並不怎樣使庫爾曼煩惱，在一天下午，他和赫耳特令與賽寧，魯登道夫會舉行會談，會談裏充滿了平常的苦澀味，伯萊斯特的情形，魯登道夫說，將德國的地位，不論在國內與國外，都是毀損與降低了。庫爾曼對托洛斯基傲慢態度的那種溫順的屈服，使協約國的領袖們都以爲德國是向共產黨搖尾乞憐，要求和平。當庫爾曼自己甘願給沒有武裝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對待，那麼舉行不利於德國和德軍的公開宣傳時，他們怎麼能够希望來會迫勞合·喬治與克利孟梭呢？

接着與登堡也要求，東線的情形應該儘早的加以解除，即使祇在軍事立場也好，因爲合約一旦訂以後，東線便必須保留幾個調赴西線作戰的師團。不要再游移不定了，這位將士說；如果俄國人還是一味拖延的話，便得重開戰端。這准可將共產政府推倒，而繼任的政府，一定是會簽訂和約的。

爲了讓步一些起見，大元帥與魯登道夫在德波邊界上，又重新劃了一個「保護地帶」的新界線，這算是他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條新的界線，大約在十二月克累那亦原定的一幅地圖，和一月二日德皇在柏萊甫會議席上，聽了魯登堡的忠告，而欽定的那幅地圖的中途。這是最高統帥部方面的最後的妥協。他們要求庫爾曼根據這幅地圖從事談判。可是庫爾曼不是這樣容易就給最高統帥部嚇退的。他的地位實在比一般人看來的鞏固，當與登堡和魯登道夫竭力要求德皇將他下職的時候

，奧國政府竟能鼓起勇氣來，堅持要他留任，而威廉二世也決定衛護他。最高統帥部雖則沒有達到將庫爾曼革職的願望，可是德皇到底被逼將他的內閣的主腦人物，豐·范倫蒂尼伯爵 (Von Valentini) 免職了，他是一個專心致力於帝國職務的官員，他以前曾爲了支持柏特曼·和爾味，使魯登道夫大爲憤怒，而他對最高統帥部的逐漸侵害德皇與政府的特權一點，更是大膽的加以抨擊。

所以庫爾曼有了赫耳特令在後面支持，和與登堡與魯登道夫會商的時候，拒絕接受他們的命令，經過一度利害的爭執以後，他到底給他的和議政策，和反對他們露骨的侵略要求，獲得了進一步的成功，最後雙方還是妥協的同意了，這位外交大臣可以在東線繼續施行他的政策，不過這種政策，將來在西線的和議裏，卻不能再度的予以應用。

庫爾曼顯然的看到，在伯萊斯特的僵局，多少是打須使其打開了。他仍舊希望德國和烏克蘭的和議，可以強迫托洛斯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並且強使他簽訂一種和約，藉此終止相持的局面，同時最高統帥部的侵略政策，也可以不致於太過暴露，令人齒眼。

(六)

賽寧，當他回到維也納以後，發覺到國內的情形，比他所憂慮的更要壞得多。國家的情況，真是險象百出，奧政府的無能力，簡直不能使國家危急的成分減輕些。奧國首相與匈牙利首相的顯然缺乏合作，使局面更臻複雜化，而結果造成了第二次飢饉恐慌的威脅。

一月二十二日，在奧王卡爾親自主持的那次皇會會議裏，賽寧將他和俄國代表，烏克蘭立法會的代表進行和議的過程，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他說的是一個悲劇令人說的話語，可是仍舊保持一種毫不苟且的，(如果是令人驚異的)公正態度，他將在伯萊斯特·里托夫斯克過的那種優長，令人厭倦的日子，給他們刻劃下一幅逼真的圖畫，庫爾曼與托洛斯基的辯證的演技，賀弗曼的粗魯却是現實的干涉，令人增加焦急的日子，因爲國內的困難遂使他的權力與影響的減低等等，一切都是用一個舊式外交家的抑制與款遞，在皇帝與他的顧問們面前描述了的。可是

賽寧在伯萊斯特的不幸日子裏，所捱受的一切刺骨的苦痛，卻並沒有全部隱藏掉。他在精神上受傷了，他不能完全遮掩掉這次嚴重試驗所受的創傷。

這次會議必須決定兩個問題：第一，賽寧應該就賀弗曼已經展開的基礎，繼續和烏克蘭代表進行和議，藉此給飢餓的奧國獲得一百萬噸的食糧嗎？第二，如果庫爾曼與托洛斯基間仍舊繼續僵持，賽寧應該不應該與匈單獨與蘇俄議和？

奧國的首相，塞特勒，擁護賽寧在和議裏的處置，並且力言應該用可以獲得的最好條件，和烏克蘭立刻訂了和約。賽寧所概述的幾點要求是苛刻的，——將加里西亞分割成兩塊，而對於匈姆問題，定會引起波蘭人民的劇烈反對！——不過他相信即使沒有波蘭人民的表決，他可以担保議會裏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接受這一種和約的。

匈牙利的首相，韋克爾伯爵，(Count Wackerle) 則反對和烏克蘭締結和約的那種交換條件。他不懂在絕望的時候，應該採用不顧死活方法的事實，他在奧匈帝國基本的機構發生危險以前長縮了，(基本的機構發生危險，結果會造成外力干涉內政的。) 所以他主張必須另行設法。

賽寧忘記了面前就是皇帝，和歷來在這會議席上應該保持的莊嚴，他怒向這個拒絕將穀物輸入奧國，因此加重了現時危機的人物，

「當奧國的首相，和奧國的糧食部長，一致的告訴一個負責的外交領袖，說匈牙利的糧食，祇能幫助我們兩個月，除非從別處另行設法，否則以後絕對免不了崩潰的時候，你教那個辦外交的怎麼辦法？你以爲我不懂或是不覺得，採取這個步驟的危險嗎？它會使我們降低地位，那是真的，不過從一切情形看來，我們已經很久就處在這種地位了。如果你會將穀物輸進奧國來，我第一個便贊成你的主張。不過你既然拒絕那麼援助，我們可就像是一個住在火燒着了的四層樓上的人一樣。他不願停下來計算一下，如果跳下去的話，他會跌斷一條腿或是兩條腿，他寧願冒死而不願確信跌斷幾條腿的。」

這位外交大臣，將其他的反對全置之不睬，他直接向皇帝懇求，將

責任完全放在卡爾皇帝身上。而皇帝自從即位以來，他便一逕做着皇帝的顧問。這位皇帝並不是一個意志堅強，敏於判斷的人物，可是那一次，他却是堅決而又正確的決定了。他毫不躊躇的支持賽寧，授權他依照原定的計劃，與烏克蘭訂立和約，並且在原則上，他也贊同對俄單獨訂立和約。

所以當這位外交總長回 華備在奧國代表團前作公開答覆威爾遜十四和平條件的演辭時候，他的心境可說是完全冷靜了。不過他的慰籍時間很暫，在一月二十三日，留駐在伯萊斯特的奧國代表人員之一，衛斯納（Wissner）打了一個電報來，報告他從越飛那兒得來的消息，大旨是哈科夫的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已經決定派遣兩個代表，來參加中歐同盟國的和議。這兩個代表將是蘇聯代表的一部分，前時基輔的立法會代表所訂的一切協定，他們極不承認，因為立法會只是代表資產階級，所以也就是不能代表整個的烏克蘭的。就在賽寧閱讀衛斯納的報告的時候，立法會的主席已經辭職，業已佔據業卡志麟堡工業區和頓尼次（Donetz）煤田的紅軍，正在向基輔挺進。那是托洛斯基對烏克蘭和講成青的一個反攻。和立法會訂立的協定，不再是和烏克蘭訂立的協定了。賽寧，在他的一月二十四日的演說裏，詳細的回答了威爾遜，他說他能够「十分愉快的」接受美總統的幾條建議。他一再的宣稱，他對俄

小言

在「列寧外交史」中，關於列寧當時順應俄國民衆和平的要求，與德簽訂和約的詳細經過，雖全文尚未載完，我們已經可知大概了。列寧對俄謀和的情形，入手和汪先生的和平運動相像，但是我們深信汪

國不要求「一寸土地與一個銅子」，而他所根據的和議原則，是絕對沒有侵略野心，沒有賠償要求的那種。奧國對波蘭也是如此，「我們什麼都不要……波蘭的人民，可以自由不受一些強迫的，揀選他們自己的命運。」在他個人方面，他更希望波蘭能够在伯萊斯特，成爲一個活躍的參加者，可是蘇俄代表堅不承認現在的波蘭政府，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健全代表。

他和他的同僚們檢視德俄間要求的距離，力言必須給它們找到一種妥協，然後再是給他和烏克蘭議和的一件事，作一種熱情的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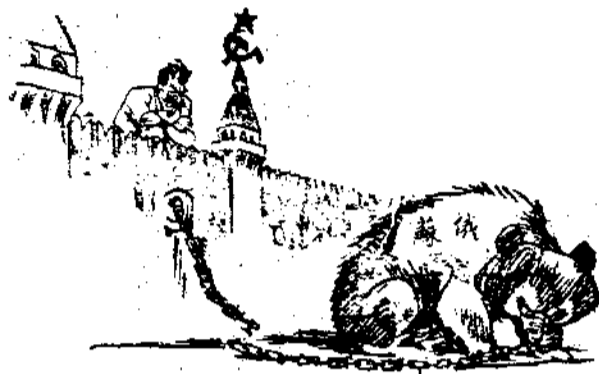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並不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或是侵略主義的計劃，而是使我們人民明白，他們將最後得到一種他們所艱苦支持的報酬，那便是他們所等待的食物。如果你願意破壞和平，如果你願意放棄穀物的供給，那就怪不得你要用演說，革命，罷工與示威，來強迫我做所不願做的事了。……如果你在後方佈置好罷工……你就無異於割去你自己身上的肉，而那許多以爲使用這種方法，便可以促使和平實現的人，更是大的錯誤。……你們必須幫助我，不然便是打倒我；那兒再也沒有其他的法子了。」

三天以後，他抑鬱的可也是堅決的到伯萊斯特去了。這個僵局必須加以打破。
（第五章完，全書未完）

先生的和平運動，要圓滿得多。第一，列寧是出身平民，所以他組織政府，必須把沙皇宮廷的所有官員一律排除，而列寧的部下，卻又個個都沒有行政經驗的，所於蘇俄的新政府，簡直覺得不像樣子。至於汪先生

，則係黨國領袖，所有淪府的文武官員，都是故舊門下，將來一旦他們恢復自由，自然共同努力，一切組織人事都可一仍舊貫。第二，列寧在媾和之外，又夾了社會制度問題，所以社上發生了空前的混亂騷擾。至於汪先生在媾和之外，雖然也夾了社會問題在內，但性質卻適得其反。列寧是把舊社會制度根本推翻，把共產制度實行起來，汪先生是把共產

制度逼下去，維持原有的社會制度，而難以變遷的改造，歸納起來，列寧是解決對外戰爭以從事對內鬥爭，所以俄國混亂到今；汪先生的解決對外戰爭，同時對內防共建國，所以中日間的和平一旦實現，東亞的整個和平也可實現了。



蘇俄是一個最自由的國家



「勞工們！一齊起來！」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凡有專著，概所歡迎，譯者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者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查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新世紀 第二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印人 唐 士 林

承印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版期 半月刊 每逢一號及十六號 出版

零售國幣一角（港幣五仙）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C字五八九號

新世紀定價表

冊數	定價	國內郵資	國外郵資
一冊	一角	一分	一角
半年	一元	一角	一元二角
全年	二元	二角	二元四角